

内容摘要

“三月三”在我国古代又名“上巳”、“重三”，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社会汉族地区在春季举行的重要节日。

早在先秦时期“三月三”就开始了孕育萌芽，它的起源与上古时期以物为侯^①的记时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岁时信仰有着密切关联，同时又交织着古人的水崇拜意识与生殖崇拜观念。

“三月三”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先秦至汉的萌芽成型期、魏晋至唐的成熟兴盛期和宋以后的消沉期三个发展阶段，并呈现了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全民祭祀向两性娱乐方向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祭祀活动减少与两性娱乐性活动的日益增多。“三月三”的娱乐化道路，较之中秋、元宵等传统节日，更多的体现了两性娱乐的特色。二是“三月三”呈现了由全国性节日向地方性节日演变的趋势。宋之后，“三月三”日益地方化，节俗也日渐分化，其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春季重大节日的地位开始动摇。

“三月三”的消沉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亦有与寒食清明相融合、受到宋代理学制约等缘故。除此之外，具有上巳遗风的涉县娲皇宫庙会表明宋以后日趋兴盛的庙会文化与“三月三”文化的融合是中原地区“三月三”走向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我国重数奇数序列^②的传统节日中，如今唯有“三月三”较为不显。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三月三”而今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在我国绝大多数中原地区“三月三”已经消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虽已将“三月三”纳入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作为汉族传统节日的“三月三”不应只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重拾汉族地区失落的“三月三”文化迫在眉睫。上海师范大学女子文化学院将“三月三”文化引入了大学校园并且创办了“三月三·女儿节”，创立校园文化空间，将大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态“博物馆”，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① “以物为侯”主要指先民通过对自然界花草虫鱼鸟兽日月星辰等自然物体的周期性活动的观测来感知自然时序的变化。

^② 刘晓峰在其《论重数节日序列及其阐释系统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中，存在着一个由正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结构而成的一个特殊重数节日序列。”

本文运用民俗学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三月三”这一中华传统节日的起源进行探析、对其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对其消沉的原因进行重新阐释以及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个案研究，从而进一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传统节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解决方式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宽松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传统节日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官方的提倡和重视是传统节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有意识的发挥创造力、对传统节日进行适度的现代化改造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三月三” 历史演变 消沉之谜 现代创造

Abstract

"Sanyuesan Festival" is called "Shangsi" or "Double Third". It's a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 with a long history of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nd it's also an important festival of the Han Chinese regions held in the spring in a traditional society.

Early in the Qin Dynasty, "Sanyuesan Festival" began to breed seed, and its origin has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record time by things and age faith of ancient tim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terwoven to the ancient awareness of worship to water and reproductive worship.

"Sanyuesan Festival " had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first was bud and forming period (from Qin to Han Dynasty), the second was mature and flourishing period (from Weijin to Tang Dynasty), and the third was period of depression (after Song Dynasty), which show two kinds of trend. One is the universal worship changing into the gender entertainment, which mainly manifested that the sacrifice is reducing while the gender entertainment is increas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estivals such as Mid-Autumn Festival and Lantern Festival, Sanyuesan Festival is more displayed with gender entertainment. Another is national festivals changing into local festivals. After Song Dynasty, Sanyuesan Festival became more and more localized and also its customs became subdivided. The social position as one of the major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spring began to shake.

The depression of " Sanyuesan Festival "has many reasons, e.g.,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with Tomb-sweeping Day, being constrained by philosophy of Song Dynasty and so on. In addition,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on the depression of "Sanyuesan Festival "in Central Plains is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fluorescent temple culture and the " San Yue San Festival" culture after Song Dynasty, which is proved by Shexian Nuwa palace temple with Shangsi legacy.

In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 of odd multiplicity sequence, only Sanyuesan Festival

becomes insignificant.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culture, "Sanyuesan Festival "faces a severe test of survival. It has died out in most Central Plains. Many minorities have put "Sanyuesan Festival "into th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oject. But as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Han areas, i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minority areas. It's necessary to resume" Sanyuesan Festival "culture of Han areas. Women's culture colleg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as recruited" Sanyuesan Festival "into the campus culture, founded the " Sanyuesan daughter Festival", created campus cultural space, and made the university as a dynamic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museum", which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contemporary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With folklore theory and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ory, combining with field survey data, the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Sanyuesan Festival", sorts out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explains the reasons of its depression and makes case studies to its development status. The author makes a further research to plights and ways of solution about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the context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paper argues that liberal and open social culture provides the basic premi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the official promotion and attention is an important impetus for its development, conscious creativity and a modest modernization to traditional festivals is the important method of the festival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anyuesan Festival Historical Evolution Depression Mystery
Modern Creation

目 录

绪 论.....	1
一、“三月三”相关概念	1
二、“三月三”研究综述	1
三、研究对象及资料来源	2
四、研究方法的内容	3
五、研究目的及意义	4
第一章 “三月三”起源探析	5
第一节 “三月三”原型与上古的物候岁时观	5
一、“三月三”原型与以鸟为候	6
二、“三月三”原型与以蛇为候	7
三、“三月三”原型与以星为候	7
第二节 “三月三”原型与古人的水崇拜文化	9
一、古人的水崇拜文化	9
二、水滨祓禊与水的驱疾功效	10
三、浮枣、浮卵与水的生殖功能	12
第三节 “三月三”原型与先民的生殖崇拜文化	13
一、先民的生殖崇拜文化	13
二、高禘祭祀与生育神崇拜	14
三、“会男女”之俗与性交崇拜	15
第二章 “三月三”的历史演变	18
第一节 汉代上巳节的孕育与形成	18
一、汉以前上巳节的萌芽	18
二、汉代上巳节的成型	21
第二节 魏晋至唐“三月三”的成熟与兴盛	24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月三”：节期的固定与节俗的娱乐化	24
二、唐代“三月三”：新节俗的出现与宴饮的制度化	28
第三节 宋之后“三月三”的失落与消沉	31
一、有关文献记载与文学创作的减少	31
二、官方对“三月三”重视度锐减	33
三、民间“三月三”活动的减少	34
第三章 “三月三”消沉之谜新解	36
第一节 关于节日失落问题的思考	36
第二节 “三月三”与寒食、清明的融合	37
第三节 “三月三”与庙会文化的融合	38
一、《梦粱录》里的疑问	38
二、我国的庙会文化	39

三、具有上巳遗风的涉县娲皇宫庙会	40
第四章 “三月三”的现代传承与创造	47
第一节 “三月三”现状分析	47
一、我国少数民族的“三月三”	47
二、我国汉族地区的“三月三”	49
三、邻国“三月三”概况	50
第二节 “三月三”个案研究	52
一、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	52
二、校园文化空间的创立	56
三、大学作为非遗“博物馆”	57
第三节 “女儿节”功能分析	58
一、调剂生活功能	58
二、性别教育功能	59
三、文化认同功能	61
结 语	63
致 谢	65
参考文献	66
附录一：上海师范大学“三月三·女儿节”图片资料	69
附录二：涉县娲皇宫庙会图片资料	7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72

绪论

节日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时间节律,是民众生存智慧的体现,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月三”是我国传统节日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节日之一,它两千多年的演变轨迹为我们探讨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传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三月三”相关概念

一提及三月三,多数人都首先想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月三”,许多学者也曾撰写过一些有关少数民族“三月三”的文章,如李桐的《广西壮侗民族“三月三”节日文化研究》、陈兰、陈立浩的《“三月三”节日民俗试论》等等。然而,“三月三”这一概念并不单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节日“三月三”,我国古代的上巳节发展到魏晋时期时将节期定于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此后民间俗称之“三月三”。《中国风俗辞典》“三月三”条中就指出“三月三”包含了两个意义:一指“我国南方许多民族的传统节日”;二“即上巳节”。^①本文使用了民间的习惯称谓“三月三”一词,其内容即包涵我国古代的上巳节,同时又涉及我国少数民族“三月三”的相关活动。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总体上使用“三月三”一词,但由于汉代人以三月上巳日为节,所以汉代部分使用“上巳节”一词。

二、“三月三”研究综述

“三月三”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节日。对于“三月三”的研究虽不如春节、端午、中秋等至今留存的节日的研究那么详细全面,但也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过一定的研究。二十世纪90年代成林的《“三月三”溯源》、覃桂清的《“三月三”源流考》对三月三的起源做了一些简单的探析。不少学者对我国古代三月三上巳节的节俗进行了研究探讨。孙作云先生就曾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的两篇文章《诗经恋歌发微》和《关于上巳节(三月三日)二三事》中,对古代中原地区三月上巳节的祭祀、祓禊、求子、男女聚会、唱歌、恋爱等礼俗活动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另外,张丑平的《上巳节祓禊习俗与水的文化内涵》、吕静的《上巳节沐浴消灾习俗探研》、赵维平的《古代的上巳

^①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9页。

节和修禊事考》着重对三月三的祓禊活动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某一时期的上巳节的活动与节俗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如张勃的《唐代节日研究》第三章与刘维治的《从唐诗看唐代三月三上巳节俗的流变》以及贝堤栗的《上巳节:盛唐狂欢在曲江》重点论述了唐代上巳节的盛况以及上巳节节俗在唐代的变迁,魏向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节俗的嬗变》与彭维的《南朝——上巳侍宴诗文的全面繁荣期》则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巳节的兴盛及其节俗在当时的演变。

除了起源与节俗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三月三进行了比较研究。鞠培霞的硕士学位论文《上巳节与少数民族“三月三”节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覃妩周的《汉族上巳节对南方少数民族“三月三”的影响研究》以及韦润物的《南方少数民族“三月三”与古代中原上巳节习俗关系探讨》,这三篇文章将古代的中原地区的上巳节与现代少数民族的三月三做了比较并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王秀文的《中日三月三节俗比较分析》、(日)李心纯的《从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到日本的雏祭》则对中日两国三月三的不同节俗做了分析比较,并且对“三月三”习俗在两国的传承与变化做了比较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月三进行了地域研究。如李桐的《广西壮侗民族“三月三”节日文化研究》、王之涵的《新叶村三月三的文化考察》、蓝雪华的硕士论文《浙江丽水老竹畲族镇畲族“三月三”变迁研究》以及陈兰、陈立浩的《“三月三”节日民俗试论》等文章对主要对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月三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由上述可见,虽然前辈学者对“三月三”的研究做了不少努力,但总体上来说对于“三月三”的研究相对分散,不够系统与全面,未曾对其起源、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大部分学者侧重古老节俗与少数民族地区“三月三”的研究,未曾涉及我们当代的“三月三”,尤其对我们现代都市中新兴的“三月三”缺少关注与研究。另外,前人的研究无论是节俗内容研究、还是比较研究、地域研究都未曾从节日功能角度出发对“三月三”的节日功能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及资料来源

本文以“三月三”这一节日为研究对象。时间上包涵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漫

长历史时期之内三月三的演变发展状况。地域上涵盖了国内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及国外的日本韩国等地“三月三”的发展状况。

资料主要来自古籍文献、地方志、田野调查、各学科学者研究成果这几方面:

(一) 古籍文献及地方志。本文的许多资料来自汉代班固撰、颜师古注的《汉书》(中华书局, 1975年)、宋代范晔撰唐代李贤等注的《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年版)、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年版)、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中华书局, 1974版)清代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1958年版)、以及《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1960年)、《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年版)、《全唐文》(中华书局, 1983年影印版)等古籍资料。地方志主资料要来自丁世良、赵放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清代涉县县令戚学标主持修撰的《涉县志》(嘉庆四年二月刊)以及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涉县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1998年)。

(二) 各学科学者研究成果。萧放著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 2004年版), 刘晓峰著的《东亚的时间: 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 2007年版)廖冬梅著的《节日沉浮问: 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杨琳著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张勃、荣欣的《中国民生通志·节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7年。)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的《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 2006年版), 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笔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以及部分理论的支持。

(三) 田野调查。通过对河北涉县娲皇宫庙会的考察获得当地农历三月的娲皇庙会资料, 通过对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三月三·女儿节”活动的调查以获取当代“三月三”研究的重要资料。

四、研究方法及内容

(一) 研究方法。在研究中, 笔者拟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文献研读法, 即通过《诗经》、南北朝诗歌、唐诗等文献记载还原“三月三”的本来面貌及其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

2、田野调查法, 即通过实地考察获得研究资料并激发新的研究思路。例如,

通过对河北涉县娲皇宫庙会的考察获得当地三月民间庙会的资料并引发对“三月三”消沉原因的重新思考,通过对上海师范大学女子文化学院“三月三·女儿节”活动的调查以获取有关当代“三月三”发展状况的重要研究资料。

3、比较研究法。通过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国与邻国、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乡村与都市“三月三”发展状况的对比,探讨当今社会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 研究内容。本文主题部分主要分为四章。分别是:“三月三”起源探析、“三月三”的历史演变、“三月三”消沉之谜新解、“三月三”的现代传承与创造。其中,第一章主要从原始文化的角度对三月三的起源进行探析,第二章主要对三月三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第三章结合涉县娲皇宫的田野调查对“三月三”的消沉之谜进行了重新阐释,第四章对当代国内外“三月三”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对上海师范大学创办的“三月三·女儿节”及其功能进行了个案研究。

五、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主要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在我国的奇数重数节日研究中,对元旦(正月初一)、端午(五月初五)、七夕(七月初七)、重阳(九月初九)的研究较多,惟独对“三月三”的研究较薄弱,本文的研究希望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第二,为我国现代节日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通过对“三月三”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论述、对“三月三”的起源和消沉之谜的探索,对“三月三”的历史演变过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探讨节日的演变规律及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为我国现代节日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第三,探讨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之道。通过对“三月三”当代发展状况的分析及个案研究探讨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进而对希望对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及发展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第一章 “三月三”起源探析

“三月三”的前身为汉代的上巳节，因此要对“三月三”的起源进行探究就无法避开对上巳节源头的探索。对于上巳节的起源，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探讨。有的学者认为上巳节源于上古时期与华夏民族的蛇图腾信仰、高禘祭祀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的女媧祭祀活动^①，有的对祓禊活动的源头进行追溯认为上巳节起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②，还有的认为上巳节的最初涵义是性爱狂欢，源于原始社会的性禁忌制度。^③……对于上巳节起源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那么，“三月三”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它的生成与上古人类的那些文化观念有关？本章将着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节 “三月三”原型与上古的物候岁时观

岁时是先民“在实际的生产生活经验中逐渐生产的时间观念。岁是年度周期，时是年度的季节段落，岁与时的配合，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时间标志体系。”^④岁时来源于古代先民对于自然节律周期性变化的经验感知。古人对于气候季节变化的感知是通过对自然界花草虫鱼鸟兽日月星辰等的周期性活动的观测而完成的。鸟类的迁徙、星象的变化、草木的枯荣、虫鱼的律动都曾是先民用于描述和判断自然时序的重要手段。这种以自然界物体变化为时间界定的岁时观念是上古岁时节日产生的思想基础。“三月三”作为先秦时期便已经开始萌芽的古老节日当然也不例外。以鸟类迁徙为时间标志、以动物的季节性活动为时间标识和以星象变化为时间标记这三种古老的记时方式以及随之形成的岁时信仰是“三月三”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

^① 刘晓峰《东亚的时间》，中华书局，2007年，第355页。

^②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③ 成林《“三月三”溯源》，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

^④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8年，第6页。

一、“三月三”原型与以鸟为候

三月三民间曾有迎玄鸟之俗。《昌黎县志》载：“三月三日曰‘蟠桃会’。……男女俱簪柏叶，若门前插柳，以迎玄鸟，今则不然。”《滦州志》三月条载：“旧志谓男女簪柳为饰，做面燕插檐，以迎玄鸟。”早在《礼记·月令》中就曾载：“仲春二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谋。”为何三月三日要迎接玄鸟？为何玄鸟至之日要举行祭祀活动呢？这恐怕与古人以鸟类迁徙为时间标志的岁时观不无关联。

“以鸟类的活动节律标示时间，是古代常见的记时形式。”^①《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曾记载了少昊族以鸟为历纪的历史传说，传说分、至、启、闭四个时间段是由四种鸟来掌管。“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也者也；赵伯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凤鸟是掌控整个鸟纪的神鸟，其它都是候鸟的化身。玄鸟即燕子，春分来，秋分去，因此为司分之鸟；赵伯即伯劳鸟，夏至来，冬至去，因此为司至之鸟；青鸟一名（又叫）鸛鷀，立春时开始鸣叫，立夏时候止歇，被作为司启之鸟；丹鸟一名鷩雉，立秋来，立冬去，被作为司闭之鸟。^②

古人对于二分、二至、两启、两闭八个时间点的判定是以四种候鸟的季节性活动为标识的。玄鸟掌管二分（春分、秋分），玄鸟的到来，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意味着一系列春季活动的开始，对于以采集和打猎为生的初民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标志。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先民在这一天举行了群体性的祭祀活动，一方面告知众人春天的到来，春季活动的开始；一方面用他们惯用的巫术方式驱除先民内心的恐惧，祈祷新的一年内的平安吉祥。因此，也就有了地方志中记载的迎接玄鸟习俗以及古籍中玄鸟至之日的祭祀活动。

春分时节的到来基本上都是农历二月，这与古人记载的仲春二月为玄鸟至之时刚好吻合。至于迎玄鸟的时间为何为从仲春二月移至三月三日？学者刘晓峰在《东亚的时间》一书中所说：中国古代的节日从起源到发展，经常是“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③历法和气候的演变可能是发生此变化的主要原因。

^① 萧放著《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8，第8页。

^② 萧放著《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8，第8页—9页。

^③ 刘晓峰著《东亚的时间》，中华书局，2007年，第17页。

二、“三月三”原型与以蛇为候

除了以鸟类活动为时间标志外,把一些特殊动物的周期性活动为时间标志也是较为常见的。蛇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动物。民间“三月三,蛇出山;九月九,蛇进土”的谚语,是对蛇的生活习性的简要概括。蛇每年的重阳节之后开始进入冬眠,次年惊蛰开始复苏,农历三月三出洞。蛇出洞后开始择偶交尾,这个季节在野外常会见到交尾的蛇。

春天蛇的出现对先民来说是一种时间的暗示,它暗示人们繁育后代的最佳时节到来。先民通过观察读懂了这种暗示,并付诸实践。于是便有了上古时期仲春之月的野合习俗。《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①郑玄注曰:“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郑玄结合阴阳理论来对该俗进行解释,但最终归结到了“顺天时”上。而这种“天时”的到来便以蛇的出现为标志。随着时间的变化,后人对这种以蛇出现为时间标志的岁时观念越来越淡漠,因此,在理解先民的习俗时便无法真正理解其原始的意义。描写先秦时期郑国男女春天相会习俗的《诗经·郑风·溱洧》就被后人认为是“淫风”,^②其实,结合古人以蛇为候的岁时观念来看,那仅仅是古人顺应天时而进行的季节性活动,就像人们冬天要穿棉袄,夏天要穿裙子一样。直到汉代该习俗仍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后汉书·鲜卑传》又曰:“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

以蛇的出现为时间标志,根据蛇的周期性活动安排人类的生活是先民掌握时间的重要手段。有学者根据壮族地区三月三的祭祀蛇神活动认为三月三与在汉代选择“巳日”为节与汉人的蛇崇拜有关。^③其实,比蛇崇拜更早的应该是古人“以蛇为候”的岁时观。

三、“三月三”原型与以星为候

古人除了对空中的候鸟、地下的游蛇的周期性活动进行观察而认识时间之外,

^①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32页。

^② 毛传指出“《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1页。

^③ 刘晓峰著《东亚的时间》,中华书局,2007年,第108页。

还通过星辰位置的变换来判断季节的转换。初民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天上的星辰变化与世间自然季节的转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将天上众多星辰概括为二十八宿星象,又将二十八星宿分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大天区,先民将每个天区星宿的形状想象为四种动物的模样,称之为“四象”。四象与四方结合,引领四季,是上古时空观念的典型模式。”^①上古时期的人们十分重视星象的时间标识意义,大火星、北斗星等都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时间标识星辰。《诗经·豳风·七月》中“七月流火”的诗句便是对大火星运行轨迹的描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将言寒,先著火所在。”可见,在古人眼中四季寒暑的交替的时间与大火星的位置是密切关联的。

玄武是四大天区中位于北方的星宿群,“玄,龟也,武,蛇也,此本虚、危星(北方七宿中的星宿)形似之”^②。玄武是形如龟蛇的星座。玄武主要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个星座。其中斗星最为著名,斗星又分为南斗和北斗,古人有“北斗注死南斗注生”的说法。干宝《搜神记》卷三中颜超增寿的故事里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除了形如勺状的斗星之外,玄武星宿群中的“牵牛”“织女”二星也较为有名。汉张衡《周天大像赋》曰:“眺北宫于玄武,泊南斗而牵牛。”由于这些星座所具有的标识时间、指示方位的功能对于古人的生活十分重要,于是将其幻化为神。宋时,为避讳玄武改称“真武”。

民间传说三月三日是真武的诞辰,许多地方在这一天举行祭祀真武圣诞的活动。民国二十二年广西《同正县志》载“(三月)初三日,又系‘玄天上帝诞期’。若遇三年大醮会,亦于是日出游,各街致祭。”^③清光绪四年海南《安定县志》曰:“三月初三日‘真武诞’”^④民国二十五年海南《儋县志》:三月“初三日,庆‘真武诞’。”^⑤宋代吴自牧也曾在《梦粱录》“三月”条曰:“兼之此日(三月三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⑥《月令广义·三月令》载:“(三月初三

^①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8年,第18页。

^②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③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12页。

^④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117页。

^⑤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124页。

^⑥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日)北极玄天真武上帝诞。”^①现今台湾农历三月三日也有祭祀玄天上帝(北方之神、北极之神)的活动。据说三月三为玄天上帝的生日,这一天人们要到供奉玄天上帝的庙里,进香、许愿、举行庆祝法会活动。^②对于真武诞的信仰最早可以追溯至古人以星辰变化为时间标识的岁时观。

上古时期以自然界事物的周期性变化为时间标识的岁时观是节日产生的原始思想基础。在我国古代的节日体系中,“三月三”的起源较早,因此,上古时期的物候岁时观在“三月三”的节俗中留下了不少印记。上古人类以物为候的记时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岁时信仰是“三月三”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第二节 “三月三”原型与古人的水崇拜文化

“三月三”不仅与上古的物候岁时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还具有浓厚的水崇拜文化印迹。“三月三”的许多节俗都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水滨祓禊、曲水流觞、临水浮卵、水上浮枣、水边宴饮等。这些节俗折射出了古人浓郁的水崇拜意识。本节结合“三月三”与水有关的节俗活动探讨“三月三”所蕴含的水崇拜文化。

一、古人的水崇拜文化

水崇拜是原始社会最古老的宗教信仰之一。水是万物之源,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保障,水与人类的生活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③有了水的滋润植物可以枝繁叶茂、动物可以羽毛丰满、自然万物顺利生长。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我们生存的当代社会都没有办法离开水而正常运转。原始社会,先民的生存力还极为低下,对水滋润万物的神秘力量的迷惑不解与对滔天洪水毁灭性场面的畏惧与恐慌,使得先民对水的神秘力量顶礼膜拜。水崇拜在我国先民的原始信仰中是“最古老也最直接”的。^④“水所带给人类的福祸远远超

^① [明] 冯应京辑《月令广义》,齐鲁书社,1997,四库全书存目图书。

^② 赵颐柳《游遍台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③ 《管子》第十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

^④ 乌丙安著《中国民间信仰》,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过了其它一切自然物,因此水成为人类最早产生并延续最久远的自然崇拜之一”。

①

我国古代社会有诸多的水崇拜现象。早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女娲理水、大禹治水等大量的洪水神话与治水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初民对水的神秘力量的人格化与神圣化的反应,同时也是古人水崇拜观念的产物。在现代考古中也发现了许多刻有各种水状波纹的陶器,如仰韶文化河南大河村出土的陶器上便刻有波浪纹、水草纹等水状纹。这些水状纹表明了水与原始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它们不仅是原始人类审美观的简单表现,更是其崇水观念的形象表述。

古人的水崇拜观念还表现在人们对水的种种神奇功能的信仰上。在先民的思想中水是神洁的,是具有种种神奇功能的,它可以育佑庄稼、可以消灭除疾病、甚至具有生殖能力能帮助人类繁衍后代。水与庄稼的密切关系是十分明显的,雨水充沛则庄稼丰收,雨水稀少或过多农作物产量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古代有了众多的巫术祈雨仪式。总之,古人择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以及水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先民对水顶礼膜拜,并随之形成了水崇拜文化。

二、水滨祓禊与水的驱疾功效

在我国古代三月初三这天,古人有前往水边沐浴祓禊的习俗。水滨祓禊是三月三最古老的习俗之一。它表面上是古人的一种沐浴活动,实质上是具有驱邪避凶意图的宗教巫术活动。水是整个祓禊活动的核心元素,也是达到人们驱邪目的的主要中介物质。

水滨祓禊是古人的一种沐浴活动。“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应劭《风俗通》)禊是古人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祓除活动。阴历三月三日所行为春禊,七月所行为秋禊。^②“禊”是去垢使清洁之意,因此与沐浴活动密切相关。

《周礼·春官·女巫》中“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的记载关于祓禊活动的最早记载。郑玄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③周代的沐浴活动与我们今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沐浴活动是群体式的,并且是有专人主持的,要通过一定的仪式之后才可以进行。在沐浴之时,还会加入香薰草

① 向柏松著《中国水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② 乔继堂、朱瑞平主编《中国岁时节令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③ 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

药。古人用于祓禊的河流还是比较讲究的，必须是具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河流，不能是湖泊之类的死水。《后汉书志第四·礼仪志》曰：“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①这里的“东流水”便是古人理想的祓禊场所。《诗经·溱洧》中也生动记录了古人春季的祓禊习俗“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溱、洧两河是古代郑国百姓祓禊沐浴的主要场所。每逢三月上巳之日，人们来到郊外的河水边，用流水沐浴而祈求远离疾病与不祥。这便是古人三月上巳的水滨祓禊习俗。

“三月三”的祓禊活动还是一种以水为主要驱邪方式的巫术活动。祓，“除恶祭也”^②，是古人为了除凶避疾而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古人祓除活动或于岁首在宗庙、社坛中举行或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但“尤以阴历三月初三上巳日在水边举行最为流行”。^③古人进行祓除的方式很多，《中国风俗辞典》中列举了举火、水滨沐浴、用牲血涂身三种。^④俞平伯在其《与绍原论祓》一文中指出祓是各种方术的总称，并列举了其所包含的五种方术：以火祓、以水祓、以声祓、以臭祓、以器具祓。^⑤其中，所谓以火祓是指送丧回吉时从火盆上跨过之类借助火光驱除不祥的方式；以声祓则指鞭炮、锣鼓等用巨大声响驱除不祥的方式；以臭祓则指用艾草、菖蒲、雄黄等物的奇特气味驱走不祥的方法；以器具祓则指用桃、柳等自身具有避邪功能的物体把不祥驱走。而以水祓则主要指用水洗除不祥。俞平伯还指出以水祓是“最习见的”。三月三的水滨祓禊活动便是俞平伯所说的用水洗除不祥的水祓。

水滨祓禊的核心元素是水。与上文提到的火祓、以声祓、以臭祓、以器具祓。等祓除方式不同，水滨祓禊指的是“以水祓”，即在水边举行的以沐浴洗濯为主要内容的祓除活动。无论是郑国的“溱河”、“洧河”还是官民皆濯的“东流水”都是古人举行祓禊活动的理想场地。沐浴是人们实现驱邪避凶的重要手段，而水便是沐浴最重要的物质。古人通过水洗去一年宿垢，以达到驱疾的作用。不但祓禊两个字本身与水有着密切的关联，祓禊的地点、祓除的主要方式也无法离开水。水是祓禊活动的重要物质。

^① [宋]范曄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0页。

^②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卷一上·八。

^③ 申士焜、傅美琳编著《中国风俗大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第330页。

^④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744页。

^⑤ 俞平伯《与绍原论祓》一文选自《杂拌儿》开明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古人通过祓禊的方式除恶驱不祥，那么为何古人为什么会认为水能祓除恶疾呢？这与古人心目中水所具有的消灾治病的神奇功效不无相连。古人认为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病人被不洁的邪魔附了体，^①身体里存在邪气所致。水是圣洁之物，可以驱除体内的种种邪气，因此水便成了消灾治病的神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水部》中便记载各种水的药用功效。流水“外动而性静”、“质柔而性刚”，主治“病后虚弱，用它煮药安神。主五劳七伤，肾虚脾弱，阳盛阴虚，目不能瞑，及霍乱吐利，伤寒后欲做奔豚。”“井水新汲，疗病利人”^②不同时节的水也有不同的治疗作用。立春的雨水，夫妻各饮一杯，同房后就会怀孕。梅雨季节的梅雨水主要用来洗疮疥，灭瘢痕。^③可见，水的确具有一定的驱疾作用。无论是《周礼·春官·女巫》中所说的“衅浴”，还是《诗经·郑风·溱洧》中的“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的兰草浴都是古人用水祓除病疾的表现。

在众多与水有关的节俗活动中水滨祓禊活动最为古老也最具典型性，是三月三其它水上活动的源头。同时，它也是三月三最古老的习俗之一，农历三月上巳之日，古人在水边洗去宿垢、祓除邪疾，虽然农历三月初的河水还稍显寒冷一些，但也挡不住人们水滨祓禊的热情，因为这一习俗下埋藏着古人对于水的眷恋与敬畏，埋藏着古人浓厚淳朴的水崇拜观念。

三、浮枣、浮卵与水的生殖功能

古人崇拜水除了因为他们认为水具有除灾驱疾的神奇功效外还因为水是生殖力的象征。水被人们视作具有生殖力的物质，人们认为水是帮助人类怀孕的重要工具。汉书中武帝祓于霸水之上便是很好的例证。《汉书·外戚传》曰：“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

《汉书》注引孟康的话说：“祓，除，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④汉武帝即位之后数年无子，上巳日到霸水上举行祓除活动以求子。一方面水可以驱除疾病，治疗不孕之疾；一方面水还是生殖力的象征，可以帮助人类完成传宗接代的大任，因此，汉武帝到霸水祈子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① 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91页。

^②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③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④ [汉]班固撰 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3949页。

除此之外,上巳节还有水上浮枣、临水浮卵的习俗。该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盛行,当时的不少诗作中都有记载。晋张协《洛褷赋》云:“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于中河。”^①晋潘尼《三日洛水作》诗曰:“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②梁萧子范《家园三日赋》曰:“洒玄醪于沼沚,浮绛枣于泱泱。”^③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踊跃鲙鱼出,参差绛枣浮。”^④陈江总《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诗》曰:“醉鱼沉远岫,浮枣漾清漪。”^⑤浮枣、浮卵表面上魏晋人的一种水上游戏,实际上还是古人生殖崇拜的遗留。除了枣子与卵自身都是生殖象征物,与生育祈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水也是一种具有生殖力量的神秘物质。雨水就与生殖有着神秘的联系。^⑥古人还通过水这一具有神秘力量的工具去祈雨祈求丰年与祈求生殖繁衍。^⑦具有生殖力量的水与同样具有促生作用的枣、卵的结合,充分体现了浮枣、浮卵活动的生殖崇拜内涵。同时,该节俗选择了枣、卵与“水”的结合而不是与其他物质结合反映了人们对水的生殖力量的崇拜。

第三节 “三月三”原型与先民的生殖崇拜文化

水上浮枣、临水浮卵等“三月三”节俗活动不仅反映了先民浓重的水崇拜意识,也折射出了“三月三”与先民生殖崇拜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生殖崇拜是人类最为古老而持久的一种崇拜文化^⑧,是远古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现象,是先民对于生存繁衍的强烈追求。高禘祭祀、男女相会这两项古老的“三月三”习俗中蕴涵着浓重的生殖崇拜意识。

一、先民的生殖崇拜文化

“生”与“死”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面临的两大终极母题。在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这两大问题更加突出。原始人类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增长率的人口生长模式使得他们对于生命的繁衍有着更为狂热的追求。据相关人士推测原始

^① 《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2098页。

^②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页。

^③ 《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2099页。

^④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5页。

^⑤ 《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三月三日》引

^⑥ 向柏松著《中国水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93页。

^⑦ 向柏松著《中国水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

^⑧ 杨甫旺著《彝族生殖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页。

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 50%，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民的平均寿命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①严峻的生存状况再加上蒙昧的先民对于生命诞生和繁衍的种种疑惑与神秘感使得生殖崇拜文化应运而生。

先民的生殖崇拜十分广泛。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多子的植物和具有旺盛繁殖能力的动物的信仰上，还表现在对生殖神的祭祀和性交活动的鼓励上。先民对葫芦、南瓜、石榴等多子植物倍加喜爱，认为食用这些瓜果可以让人类向它们一样多子多孙。同时，他们还在日常使用的陶器、石器等器物上刻满鱼、蛙等繁殖力极强的动物的图案或花纹，以期盼人类具有同样旺盛的生殖能力。不仅如此，先民还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祈求生殖生保佑先民子孙旺盛、种族兴旺，高谋神便是我国古代较早的掌管生育的神祇，高谋祭祀便是关于生殖神——高谋的祭祀活动。

二、高谋祭祀与生育神崇拜

高谋是我国古代上巳节的主要祭祀对象。高谋又称郊谋，因祀于郊外而得名，又因神坛多设于水边的高地，“高”通“皋”，所以又称皋谋。关于高谋到底是谁？是何模样？这一问题至今还颇有争议。闻一多在其《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云，夏人所祀之高谋为涂山氏，即女娲；殷人所祀之高谋为简狄；周人所祀之高谋为姜原。^②这一观点比较为学界认可。宋代罗泌《路史·后纪二》亦载：“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谋，因置婚姻。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谋之神。”^③由此可见，高谋是先秦时期各氏族所供奉的始祖神。并且，女娲是人类最早的高谋神。如今山西省河津市高谋庙中所供奉之神恰巧是女娲^④，这便是很好的佐证。高谋之谋同媧，《说文·四下骨部》：“媧，妇始孕兆也。”朱骏声注称：“按高谋之谋，以媧为义。”《广雅·释亲》称：“媧，胎也。”可见，高谋本身便是一个怀孕妇人的形象，于是人们向之祈子。由此可见，高谋不仅是一位始祖神，同时还是各氏族的生育神。

关于高谋祭祀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月令》，文曰：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谋，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

^① 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9页。

^②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载《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册，第98—99页。

^③ (宋)罗泌撰《路史》，聚珍仿宋印本，中华书局，1930年，后纪二。

^④ 闫爱武《女娲与高谋神——从河津高谋庙说开去》，运城学院学报，2005年06期。

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①《后汉书·礼仪志》亦曰：“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②古人的高禖祭祀活动在仲春二月举行，由天子率嫔妃前往，用大牢祭祀高禖，足见其规格之高。高诱注曰：“王者、后妃以玄鸟至之日，祈继嗣于高禖。”^③天子与妃嫔们祭祀高禖的目的在于祈求传承子嗣，“弓鞬”“弓矢”便是生殖象征物。郑玄也曾注曰：“帝以弓鞬，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至今通过祭祀高禖以求得子嗣的风俗在我国一些地区仍有残留，河北涉县现存的清代碑记《重修娲皇阁记》中载：“邑西二十里许有神庙焉，创建之故，世远难稽。土人做古郊禖之意。季春之月，相率祈禳于此，各得其所愿。”^④由碑记资料看来娲皇庙的初建目的由于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考证，但当地人认为娲皇庙是古代用来祭祀“郊禖”的场所。而当地的娲皇庙的主要职能便是便是祈子，如今当地的娲皇宫庙会上还保留了不少求子习俗。

祭祀高禖的主要目的是求子，而生殖崇拜又是基于古人类的“求子”需求而产生的，由此可见上古仲春的高禖祭祀与古人的生殖崇拜观念之间密切联系。先民的高禖祭祀活动蕴含着浓烈的求子意图，同时也蕴含着他们对于生育神——高禖的崇拜。后世高禖祭祀活动虽然已经衰落了，但求子之俗仍得以留存。《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载：“四川横县玉华池，每三月上已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男，瓦即是女，自古有验。”^⑤随着时代的发展先民的高禖活动已被后人遗弃，但“三月三”求子之俗却流传至今。高禖祭祀活动蕴含着先民浓厚的生殖崇拜观念。

三、“会男女”之俗与性交崇拜

性交崇拜像生育神崇拜一样也是生殖崇拜的一种，主要指对先民对于两性交合现象的崇拜。通过蕴涵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易经》不难发现，我国的先民认为阴阳交合创造了世间万物，而“阴阳”又与“男女”“天地”相对。“阴爻”代表着“女”、“地”；“阳爻”代表着“男”、“天”。因此，男女的交合也是天地的交合，天地交合则万物生长。所以，男女交合不仅关系到人类的繁衍，还与农作物丰收与否密切相关。先民们通过对男女交合祈求种族兴旺、农

^①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到243页。

^② [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07页。

^③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④ 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涉县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第963页。

^⑤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本，卷六十七。

业丰收。

“会男女”是三月三的一项古老习俗。《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①“会男女”即性爱的发生。国家法令规定仲春二月男女相会并且“奔者不禁”，如果不遵守该法令，还会受到制裁。把男女性爱提高到国家明文规定的法令条款之内，在现代人看来不禁觉得既荒诞又可笑，为何古人还郑重其事的将其写在《周礼》之中呢？古人的“男女相会”对于他们种族的繁衍、国家的兴旺都至关重要。国家通过政令的方式促进自身人口的增长，以用于壮大本族群和抵御外族的侵略。在春暖花开的春季时节，青年男女们在野外欢聚并顺应天时进行交媾以促进种族的繁衍，这是原始人类关乎生存的大事。《后汉书·鲜卑传》亦曰：“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②

男女相会还有除了祈求子嗣促进种族繁衍外，还有祈雨求丰年的意味。古人认为男女交合可兴云雨，所以在许多祈雨巫术中都有男女交合的情形。《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其早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注引董仲舒奏江都王求雩之方，曰：“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③《春秋繁露·求雨》篇末，董仲舒曰：“四时皆庚子日，令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④“庚子日”谐音“耕子日”，“夫妇偶处”与上文的“妻视其夫”意思相同，皆是男女交合活动的含蓄表达。通过男女交合活动求雨以祈求丰收是古人生殖崇拜的一种演变。通过男女交合祈求丰年的节俗到近代仍有遗存。民国二十年广西《同正县志》记载了当地旧俗每年三月各地男女、商贾、赌徒等千百成群的人们聚于山坡旷野之地举行“歌墟”活动的情形：

“女则提篮持伞，或四五人，或六七人不等，……男则游行掀看，有合意或旧好者，则唱歌挑之，彼此互答。若相悦意，女投掷（槟）而男赠糕以为定情，日夕乃双双携手而归，即夫家见之亦不为怪，以为不如是，则年不丰。”^⑤

无论“会男女”是为了达到种族繁衍之目的，还是为了祈雨求丰年，都

^①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732页。

^② [宋]范曄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5页。

^③ [宋]范曄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7页。

^④ [汉]董仲舒撰 [清]凌曙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第554页。

^⑤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12页。

是先民性交崇拜的反映，都体现了先民浓厚的生殖崇拜观念。上古“三月三”的高禖祭祀活动与男女相会习俗是“三月三”两项古老的节俗，两者都蕴涵着浓厚的生殖崇拜观念，都是古人生殖崇拜文化的体现。

综上所述，“三月三”产生于先民“以物为候”的岁时观念之下，是上古民众通过观察与实践对于时间、季节感知的结果。“三月三”古老的水滨祓禊等水上活动是先民水崇拜观念的产物，“三月三”的高禖祭祀与男女相会习俗体现了先民浓厚的生殖崇拜意识。因此，“三月三”是先民物候岁时观的产物，同时又交织着古人的水崇拜文化与生殖崇拜文化。

第二章 “三月三”的历史演变

民俗活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三月三”也不例外。从先秦至汉的孕育生成期、魏晋至唐的兴盛期到唐宋之后的消沉期,“三月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由萌芽到兴盛,由兴盛到消沉的演变轨迹,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了不同的节俗风貌。探寻“三月三”的演变轨迹,对于从宏观上把握“三月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章着重对“三月三”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梳理。

第一节 “三月三”的孕育与形成

早在先秦时期“沐浴祭祀”、“男女相会”、“高禊祭”等春季习俗已经存在,这些春俗为汉代三月上巳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经过汉以前漫长的准备期之后,汉代“三月三”终于首次作为独立的节日亮相在历史舞台上。从先秦至汉,“三月三”走过萌芽期成为了一个具有专有名称、具有相对固定节期、相对稳定节俗活动的节日。

一、汉代以前“三月三”的萌芽

汉代以前是“三月三”的萌芽时期,后世三月三的许多节俗在这一时期孕育。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春季沐浴、高禊祭祀、男女相会三大节俗活动。

(一)、先秦时期的春季沐浴活动

在《史记·殷本纪》中有关于契母简狄沐浴之时吞卵生契的记载。文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也;……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列女传》卷一《母仪传》的记载更为详细:“契母简狄者,有娥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从参与沐浴的人数来看,要么“三人”要么“与其妹娣”可知当时的沐浴是多人参加的群体性活动;从沐浴活动的地点来看,一定不是在室内,否则不可能在沐浴之时见到玄鸟堕卵,由此可知当时的沐浴活动是在野外的河流中举行的。综合来看,至少在殷商时代人

类就有了群体性的野外沐浴活动了。

除了简狄沐浴的传说外,《论语》中也有关于古人春季沐浴活动的记载。《论语》“先进”篇曾皙在谈到他理想中治理国家的方法时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①曾皙认为做一名国家的大司仪带领百姓举行春季应有的沐浴礼俗活动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他以礼治国的观点与孔子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则资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春季河边沐浴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礼俗活动,否则曾皙不会在说明他以礼治国的主张时随口举出了春季沐浴这个例子。而且这种礼俗还与名为“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任继愈《宗教大辞典》中指出:“雩,儒教的祈雨之礼。”^②“雩”是一种祭祀活动。雩祭是商周时代由女巫主持的一种求雨祭祀活动。祭祀时,女巫头戴装饰有鸟的羽毛的帽子,在土坛上带着童男童女各八人翩翩起舞,并在口里要不停地喊出“啊啊”的号呼,祈求上苍普降甘霖,舞蹈同时还伴有击鼓、奏乐活动。^③与“雩”的宗教祭祀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沐浴礼俗活动,已经具有了宗教祭祀的成分。

(二)、先秦时代的春季野合习俗

先秦时期,春季野合活动也十分兴盛。《诗经》中有不少诗篇或隐或显的反映了此类活动。著名学者孙作云在其《诗经恋歌发微》中列举了《诗经》中十五篇关于古代男女恋爱习俗的作品并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男女野合活动。其中,《诗经·郑风·溱洧》、《郑风·褰裳》、《鄘风·桑中》较具代表性。

《诗经·郑风·溱洧》曰: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

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

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郑风·褰裳》曰: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35页。

^② 任继愈《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003页。

^③ 陈运舟著《词里乾坤》,武汉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邶风·桑中》一节：

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经·郑风·溱洧》描述了在河流冰层融化之后的春季，郑国青年男女在溱、洧河边，相会嬉戏打闹并互赠爱情信物——“勺药”的情形。毛传指出“《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①可见当时该活动之兴盛。“维士与女，伊其相谑”，那么男女双方相互嬉闹开玩笑时说了些什么呢？《郑风·褰裳》给出了一种答案：“你要是喜欢我，就和我一起提起衣服过洧河，你要是不喜欢我，难道就没别人了吗？”孙作云先生就曾指出《郑风·褰裳》为男女聚会时的谑词。^②

除了在河边的嬉闹打逗外，古代男女还有春季野合的风俗，并且还有专门用于进行相会野合的地方“桑中”。《诗经》毛传曾对《邶风·桑中》里“桑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桑中，刺奔也。卫之宫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郑散民流而不可止。”可见，“桑中”即野合之地。古代的野合之地，除了“桑中”外，还有“云梦”、“社稷”之类。《墨子·明鬼》曾曰：“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对于古代的野合习俗，在《周礼·地官·媒氏》也有记载，文曰：“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③也曾有学者指出，野合习俗是来自氏族时代的季节性婚配——野合群婚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节日中的野合。^④

（三）、先秦时期的高禘祭祀活动

无论是水边的男女相会还是桑林中的野合习俗，都和高禘祭祀有着一定的联

^① [汉]毛公传 [汉]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 黄侃经文句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②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304页。

^③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32页。

^④ 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的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系。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指出：“《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与《桑中》、《溱洧》等诗所昭示的风俗，也都是高禊的故事。”^①《礼记·月令》中记载了仲春祭祀高禊的情形：“是月也（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禊，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禊之前。”^②以牛、羊、豕三牲大牢作为祭品，由天子率众妃嫔参与足见当时高禊祭祀活动之隆重。高禊是主管婚姻与人类生存繁衍的神祇，祭祀高禊的目的在于求子。“弓鞬”“弓矢”均为为生殖象征物。天子举行高禊祭祀活动的目的也在于祈求皇家子嗣兴旺。民间的祭祀活动与皇家略有不同。民间在祭仪结束时，常“以群众性的男女野合来落实祈求生殖繁盛的愿望”^③，通过野合的方式实现祈子的目的，民间要比皇家更为直接，更不受礼法的限制。

汉之前春季的水边沐浴活动、兴盛的男女相会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祭祀高禊活动为以祓禊、会男女、祭高禊为主要节俗的汉代上巳节的出现做了充分的准备，汉代上巳节呼之欲出。

二、汉代上巳节的成型

上巳节在汉代的节日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汉时期所行的五大节令为：上元、上巳、伏腊（伏日、腊日）、至日（夏至、冬至）、社日（春社、秋社）。^④其中，上巳便是汉代五大节令之一。汉代以三月上巳日为节，以水滨祓禊为标志性活动，并且已经开始出现举办盛大宴会的风俗。

（一）、汉代以上巳日为节

在汉代，时人将三月所举行的以水滨祓禊为主要活动的节日称为“上巳”。汉代郑玄在对《周礼·春官·女巫》中“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一句作注时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⑤《后汉书·礼仪上》也载：“三月上巳，官民皆挈于东流水上，……”^⑥之所以称为“上巳”是因为节期选择在了干支纪日历法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

^①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5年04期。

^②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到243页。

^③ 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8页。

^④ 尚秉和著《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435页。

^⑤ 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73页。

^⑥ [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0页。

古人为了表示事物的先后次序设计出了两套符号。一套共十个符号,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十干”,也叫“天干”;一套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符号组成,叫做“十二支”也称“地支”。十干和十二支合起来叫“干支”。十干的十个符号与十二支的十二个符号一次排列组合,可以排列出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个组合。以六十为一个周期,用它来纪年、纪日、纪时。按照古人天干地支的纪日方式,一个月会有两个或三个巳日,相对于后面第二个或第三个巳日,第一个巳日称为上巳。我们以2010年阴历三月(农历庚寅年庚辰月)为例。按照干支纪日2010年三月初一日为甲午日、接下来初二日到三十日依次是: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2010年阴历三月只有两个巳日,第一个巳日即十二日的“乙巳”日,第二个巳日为二十四日的“丁巳”日。再如,2004年农历三月(农历甲申年戊辰月)初一为戊辰日,初二为己巳日,十四为辛巳日,二十六为癸巳日。2004年农历三月便有三个巳日。无论是一个月之内有两个巳日还是三个巳日都将第一个巳日称为上巳日。汉代上巳节节期定于农历三月上巳之日。节期是节日最基本的要素,相对固定的节期是一个节日的必要条件。上巳日节期的固定,是三月三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步。

(二)、汉代上巳节的节俗活动

汉代三月上巳节以水滨祓禊为主要活动。《后汉书·礼仪上》:“三月上巳,官民皆挈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痰,为大挈。挈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挈之矣。”^①《晋书·礼志》也载:“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②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汉代上巳节的参与者是不论男女、不分尊卑等级的全体百姓;汉代的上巳节是作为一种礼仪制度而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是,两则材料明确地说明了汉代上巳节主要活动是水上祓禊,并且祓禊的主要目的是去垢除疾。水滨祓禊活动是古人于水边举行的祭祀仪式,具有浓厚的祈子意味。从整体上来看,汉代的上巳凸显了除疾祈子等具有祭祀性色彩的节日文化内涵。

^①[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0页。

^②[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一,中华书局,1974版,第671页。

汉代的三月上巳日,除了在水边举行祓禊活动外,还会举行盛大宴会。《后汉书·周举传》曾载:“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①《后汉书·袁绍传》:“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②可见,在当时上巳日宴请宾客之俗已经存在。

总体来看,汉代三月三的节日活动比较单一,虽偶有宴请宾客之俗但仍以水滨祓禊为主体,水滨祓禊是汉代三月三最近代表性的节日活动。

(三)、汉代上巳节是全民性的节日

《后汉书·礼仪上》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挈于东流水上,……”^③《后汉书·卫皇后传》中曾记载了汉武帝三月上巳祓于霸水之上^④。除了帝王外普通民众也参与到上巳活动中。东汉蔡邕的《禊文》中就描绘了汉代普通百姓在洛水边参与上巳活动的热闹情形:“洋洋暮春,厥日除巳,尊卑烟鹭,维士与女,自求百福,在洛之浹。”^⑤无论是俊美的男子还是窈窕的淑女都参与到了上巳的活动中,可见,汉代的三月三是上至帝王、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参与的全民性活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汉代的上巳节除了最主要的水滨祓禊等活动外,在贵族阶层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节日活动,它们成为了后世节俗的生长点。东汉初年杜笃的《祓禊赋》是描述了当时王侯富商们三月上巳活动的作品。赋云: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醺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罗袿,立水涯,微风掩壅,纤艴低徊,兰苏舂蠃,感动情魂。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⑥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题目为《祓禊赋》但赋文中并没有用大量笔墨描绘当时的祓禊活动。反而提及了“浮枣”、“酹酒”、“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等祓禊之外的丰富节日活动。那些王孙贵族们携美酒佳肴来到伊水边,水上时隐时现的漂浮着枣子。水边还要举行将酒洒向地面以祭祀土地的“酹酒”

^① [宋]范曄撰《后汉书》卷61,中华书局1973年,第2028页。

^② [宋]范曄撰《后汉书》卷74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2381页。

^③ [宋]范曄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0页。

^④ [汉]班固撰 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3949页。

^⑤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三七“上巳部”,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版,第2097—2098页。

^⑥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三七“上巳部”,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版,第2097页。

活动。俊儒鸿生坐在沙渚上谈诗作赋、追思怀古，这与后世三月三文曲水流觞、宴饮作赋的活动异曲同工。

汉代三月三有了相对稳固的节期——夏历三月上巳之日，有了标志性的节俗活动——水滨祓禊，同时还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节日盛会。汉代的上巳节为后世三月三的成熟与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三月三”的成熟与兴盛

汉代之后，三月上巳节继续向前发展。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三月三的成熟兴盛期。这一时期，不仅节期固定在了农历三月三日，节俗活动也日渐丰富并呈现娱乐化倾向。唐代“三月三”大量新节俗的产生和宴饮习俗的制度化，标志着“三月三”的全面繁荣时期的到来。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月三”：节期的固定与节俗的娱乐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三月三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以三月三日为题名的文章，如陆机的《三月三日》、谢灵运的《三月三日侍宴西池》、潘尼《三月三日洛水赋》、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章》等等。这一时期的三月三与其前身上巳节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节期的固定，节期由过去的夏历三月上巳日定为了夏历三月三日，并且为后世所延用；二是期节俗内容的转变，重点体现在其曲水系列活动的兴盛与节俗的娱乐化上。

（一）节期的固定。沈约《宋书》云：“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复用巳。”^①《晋书·礼志》又云：“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②为何节期会由三月上巳日转变为三月三日？有学者认为“三日与上巳期相距甚近，故并上巳节于三日”^③。在古人的干支纪日方法中，由于十二地支排列随甲子变动，每年的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也随之处于变化中，上巳日的不固定为节日的开展带来了诸多不便。加之巳日又常与三日比较接近，于是上巳改为了三日。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

^①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三十九》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36页。

^②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一，中华书局，1974版，第671页。

^③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三十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437页。

节期在魏晋时期发生改变,不能不考虑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魏晋人所崇尚的老庄哲学中有“三生万物的”哲学观念,并且明王逵《蠡海集·鬼神类》中记载“玄帝生于三月三日”。^①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想是节期变更为三日的重要契机。

(二) 曲水活动与节俗的娱乐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月三的水边活动与



曲水流觞图 图片来自: 国际在线网

http://gb.cri.cn/9223/2006/02/10/342@893320_1.htm

汉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曲水活动开始兴盛。曲水系列活动主要包括曲水流觞、曲水浮卵、曲水浮枣、曲水会等,其中,曲水流觞最为流行,也是被后世传颂最广的。曲水浮卵与曲水浮枣两项活动在当时也较为流行。随着曲水系列活动的兴盛、水滨祓禊活动的衰落,节日活动的祭祀性成分逐渐减少,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

曲水流觞活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在当时的诗作中有大量相关的

记载。“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②这是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在著名的《兰亭集序》中对当时曲水流觞活动的描述。除了《兰亭集序》外,晋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里的“羽觞波腾”、南北朝时期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中的“滥觞逶迤、周流兰殿”以及鲍照《三日诗》中的“临流竞覆杯”、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章

^①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引,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②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26,中华书局1958年,第1609页。

诗》中的“金瓶泛羽卮”等诗句^①都是对当时的曲水流觞活动的描述。据吴自枚《梦梁录》记载，三月三日的曲水流觞活动兴起于晋时。^②从诗文的记载来看，无论是王羲之永和九年的《兰亭集序》还是张华的《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关于曲水流觞的记载的确是从晋时开始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晋时的三月三水滨活动中，曲水流觞活动是与祭祀性的祓禊活动并存的。

晋陆机《三月三日》曰：“迟迟春日暮，天气柔且佳。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

晋成公綏《洛禊赋》曰：“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罍尊，飞羽觞。”^③

诗中不仅描述到了“列罍尊，飞羽觞”的流觞活动同时更多的提及了“濯秽”、“祓除鲜禊”、“濯足盥手”等祓禊活动。可见，晋时的曲水流觞活动处于刚刚兴起阶段，当时的水边活动也还未摆脱掉水滨祓禊的印迹。到南北朝时期，曲水活动渐趋兴盛。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④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对三月三日活动的描述只记录了曲水流觞这一条，足见曲水流觞活动在当时之兴盛，甚至作为当时三月三的标志性活动。

除了“曲水流觞”外，“曲水浮卵”与“曲水浮枣”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曲水活动。晋张协《洛禊赋》：“夫何三春令月……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于中河。”^⑤晋潘尼《三日洛水作》诗：“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⑥梁萧子范《家园三日赋》曰：“洒玄醪于沼沚，浮绛枣于泱泱。”^⑦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踊跃鲙鱼出，参差绛枣浮。”^⑧陈江总《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诗》曰：“醉

^① 《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三日诗》、《三月三日率尔成章诗》分别选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616页、第1154页、第1307页、第1644页。

^② “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选自吴自枚《梦梁录·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③ 《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三月三日》引成公綏《洛禊赋》，中华书局，1960年，第145页。

^④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26页。

^⑤ 《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2098页。

^⑥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页。

^⑦ 《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2099页。

^⑧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5页。

鱼沉远岫，浮枣漾清漪。”^①河面上不仅有像长了翅膀一样快速飞过的酒杯，还有白色的鸡蛋、深红色的枣子时隐时现的随波漂浮着，构成了一幅极为色彩丰富的美丽画卷。卵与枣自古以来皆是生殖崇拜物，与祈子生育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学者孙作云也曾指出，曲水浮卵的风俗与原始社会以鸟为图腾的东夷诸族有关，与简狄吞卵而生商始祖“契”的神话传说有关。^②枣作为生殖崇拜物，在我们现代的婚俗中依旧存在，人们在“大枣、花生、桂圆、栗子”四词中各取一字重新组合，再通过谐音的方式变为“早生贵子”，其祈子意味十分明显。虽然“曲水浮卵”与“曲水浮枣”仍然带有明显的原始祈子意味，但是从诗人的轻松明快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浮卵”与“浮枣”只是作为一种游戏娱乐性质的活动而存在，不再像汉代水边祓禊活动那样作为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而存在。时人更多的是以娱乐的方式继承了三月三所包涵的原始文化基因。

在“曲水流觞”、“曲水浮卵”与“曲水浮枣”这些曲水系列活动日渐兴盛的同时，其节俗的娱乐化倾向也日渐明显。“曲水流觞”活动从晋时的与“祓禊”活动并存于三月三日节俗活动中，到南北朝时取代祓禊活动成为三月三的代表性节俗，这一地位的转变也说明像“曲水流觞”这样游戏娱乐性质的活动逐渐成为三月三节俗的主体。“曲水浮卵”与“曲水浮枣”活动也以娱乐的方式传承古人三月三的祈子文化。除此之外，南朝后期的三月三还举办以水边歌舞游戏为主要内容的曲水会。“人们失去了原先的求神祓除灾气的诚惶诚恐，而专注于娱心悦目。”^③庾肩吾也在其《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曰：“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④南北朝时期的三月三活动中的临水的百戏表演也是节日娱乐性不断增强的表现。无论是“流觞”、“浮卵”、“浮枣”的水上游戏还是热闹的“百戏”与“曲水会”都是三月三节俗日渐娱乐化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月三主要发展成果有：节期变更为农历三月三日并固定下来，为后世所沿用；三月三的节日活动中曲水流觞等曲水系列活动格外兴盛，并表现出了明显的娱乐化态势，颠覆了以庄严祭祀为主的汉代上巳节。

^① 《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三月三日》引。

^②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关于上巳节（三月三日）二三事”一文，中华书局，1966年第324页。

^③ 张承宗著，《六朝民俗》，南京出版社，2002版，第291页。

^④ 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5页。

二、唐代“三月三”：新节俗的出现与宴饮的制度化

唐代的“三月三”在魏晋南北朝“三月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除了沿用魏晋南北朝定立的三月三日的节期和继续将节俗娱乐化之外，唐代的“三月三”也有一些新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踏青、竞渡等新的节俗，宴饮习俗也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制度化。

（一）新节俗的出现。唐代“三月三”出现了许多新节俗，但以踏青与竞渡两项最具代表性。

关于踏青，《中国风俗辞典》中指出：“亦称‘春游’。……泛指春天郊野游览。唐代即有此俗。”^①孙思邈《千金月令》载：“三月三日踏青。”《辇下岁时记》亦载：“唐人上巳日在曲江倾都褉饮、踏青。”^②唐人十分喜爱赏春郊游，在当朝文人的诗作中也不乏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唐人万齐融的《三日绿潭篇》就生动描写了当时的踏青的情形。文曰：“春潭滉漾接隋宫，宫阙连延潭水东。苹荇嫩色涵波绿，桃李新花照底红。垂菱布藻如妆镜，丽日晴天相照映。素影沉沉对蝶飞，金沙砾砾窥鱼泳。佳人被褉赏韶年，倾国倾城并可怜。拾翠总来芳树下，踏青争绕绿潭边。……”^③唐代诗人吴融的《上巳日》中“寻花傍水看春晖”的诗句^④与唐咸通十二年登进士第的许棠的《曲江三月三日》中“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⑤的诗句皆反映了在唐朝三月三踏青活动的兴盛。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唐代的三月三中出现了踏青这一新的节俗并广受唐人喜爱，但并不意味着踏青活动只在三月三日举行。有时踏青活动也可在夏历二月举行。《旧唐书·代宗纪》就记载了代宗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在昆明池踏青一事，文曰：“（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⑥可见，唐代的踏青节俗在时间上具有不稳定性。

除了赏春郊游的踏青活动外，唐代的三月三还出现了一项更为热闹的节俗——竞渡。唐代三月三的节日活动空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唐人不再满足于像魏晋人那样安静地坐在水边或园林里做曲水流觞之类的游戏，富

^①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100页。

^②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0“上履”条引唐《辇下岁时记》，四库全书本，第974册，第157页。

^③ 《全唐诗》卷一一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82页。

^④ 《全唐诗》卷68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03页。

^⑤ 《全唐诗》卷60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71页。

^⑥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100页。

有想象力和娱乐精神的唐人将节日活动巧然移到了装饰美丽的船上。船成为唐人新的节日活动空间。唐代每到上巳节，曲江池中就会备有供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专门享用的彩船，并且同时京兆府会大陈筵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倾城褰饮、游玩踏青，煞为壮观。^①宰相等高层官员于三月三日泛舟游于河上，而未能登船的普通官员或市民则通过竞渡游戏参与到以船为载体的三月三活动中。唐薛逢的《观竞渡》形象的描绘了唐代三月三日竞渡的热闹情形：

三月三日天清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内，江上已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引，马前已被红旗阵。两岸罗衣破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擢影千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雷声冲急波相近，两龙望标目如瞬。江上人呼霹雳声，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标示输赢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所各休去，会到摧舟折楫时。^②

到唐代，三月三的水滨活动已经悄然改为了以船为主要载体的水上活动。江上雷鸣般的鼓声、热血沸腾的竞渡场面，不仅增加了节日的气氛也极大的刺激了人们参与节日的热情。唐人的竞渡活动给三月三增添了许多活力。

唐代除了踏青、泛舟、竞渡之外还有竞射、戴柳等诸多新节俗在这一时期涌现。大量新节俗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唐代尤其是盛唐和中唐时期社会政治的安定、经济文化的繁荣的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与唐人享受人生和亲近自然生活态度^③有关。春日里尽情踏青游玩，热闹欢腾的竞渡、竞射等节日竞技游戏不仅反映出唐人热情奔放的性格，更折射出了唐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亲近自然的生活态度。当然，大量新的节俗的出现还与唐人极强的创新能力密不可分。三月三日原本有褰饮之俗，所饮之物历来都是酒，但到了唐人那里竟有“诸子”提议以茶代酒。于是他们“命酌香沫，浮素杯”，并在茶宴品味饮茶所带来的独特享受，所谓“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④唐人就on这样把流行了几百年的饮酒习俗变成了饮茶。由此可见唐人敢于尝试与创造的

^① [唐]康骕撰，《剧谈录》卷下“曲江”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2册，第693页。

^② 《全唐诗》卷548，中华书局1960年，第6322页。

^③ 程蔷、董乃斌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④ 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选自《全唐文》卷六二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6337页。

创新精神。

在唐代三月三的节日舞台上,除了大量新节俗外,传统节俗也还留有一些残影。在《唐诗纪事》中有“三日上巳,祓禊于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圈。”的记载。^①在《岁华纪丽》中也提到:“三月桃花水,上巳竹叶杯,元巳之辰,修禊之事。”^②可见,祓禊等传统活动并没有完全被唐人遗忘但在其影响力却远不及唐代的新节俗。

(二)、上巳宴赏的制度化。关于上巳宴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皇帝也常在三月三日设宴群臣,并且当时的文人也写下了不少应制之作,但毕竟还未通过国家法令的方式使其制度化,宴饮活动是否举办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兴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初唐时期。直到中唐以后,在统治者的重视之下上巳宴赏这一习俗才真正的成为了一种制度。“三月三”宴饮的制度化是在唐德宗时期形成的。当时除了举国进行宴饮之外,国家还给予百官节日费用方面的赏赐。贞元四年(788)九月颁布了《三节赐宴赏钱诏》。在此诏书中,三月三日被定为三令节之一,“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诏书中还明确了三节中朝廷各级官员的节日俸禄:“每节宰相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制。”^③贞元八年,再次下诏对三节宴会赐钱的数目进行修改,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三月颁布敕文以及唐宣宗在其《受尊号赦文》中都重申了对节日赐钱的规定。^④唐代出台的一道道关于“三月三”宴饮赏赐活动的诏书、敕文等法令文件一方面反映出唐代对“三月三”宴赏活动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唐代统治者对宴赏制度的逐步完善。

唐代统治者之所以特别注重上巳节并将其宴赏习俗制度化与其强烈的政治目的息息相关。正如韩愈在《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中所述:“四方无斗争金革之声,京师之人,既庶且丰,天子念致理之艰难,乐居安之闲暇,肇置三令节,诏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属,饮酒以乐,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

^① [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九,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页。

^② [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③ 《全唐文》卷五一,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62页。

^④ 《唐会要》卷二九,中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4页、第546页。《全唐文》卷八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862页。

其心、成其文者也。^①

唐代的“三月三”，因受到统治者的极大重视，盛况空前。踏青、泛舟、竞渡等大量新节俗不断涌现，娱乐游戏性质的活动继续增多，宴赏活动也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制度化，形成了历史上“三月三”的全面繁荣时期。

纵观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三月三”，从节期的固定、节俗的娱乐化道路的开辟到节俗的不断丰富、甚至制度化，足以表明“三月三”在一步步走向成熟与兴盛。但与此同时“三月三”传统习俗日渐衰落与新节俗（如踏青、竞渡等）的不稳定性也为“三月三”消沉埋下了隐患。

第三节 “三月三”的失落与消沉

经历了魏晋至唐的兴盛期后，“三月三”至宋代开始消沉。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关于“三月三”的记载日渐减少；官方对重三节的重视度锐减，朝廷甚至取消了重三日假期的设定。“三月三”逐渐退出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虽有所保留，但节俗分化且地方性色彩明显。

一、有关文献记载与文学创作的减少

到了宋代，“三月三”日渐式微。在记载北宋都城开封风俗的《东京梦华录》里有对元旦、端午、七夕、重阳等众多传统节日的描述，但却未提及任何关于“三月三”的风俗；在记载南宋都城临安风俗的《梦粱录》中虽有关于三月三的记载，但却是对宋以前古人三月三活动的追思与爱慕，文曰：

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右军王羲之《兰亭序》云：‘暮春之初，修禊事’，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形容此景，至今令人爱慕。^②

文中还写到“兼之此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并详细描述了三月三

^① 韩愈《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全唐文》卷五五六，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629页。

^②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日的朝圣活动。可见，曲水流觞、楔饮踏青等“三月三”传统活动在宋人的三月三日的活动中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让他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是那同样热闹壮观的朝圣活动。

在宋代文艺作品中虽也有一些以三月三为题材的作品，但已不再像魏晋或唐朝的文学作品中那般有举不胜举的应制之作。时人多以上巳为话题，或描写春日的美好春光、或借景抒情、感叹人生，大都未涉及三月三的节日活动情形，甚至连“祓禊”、“踏青”等字眼都很少提及，即使偶有涉及也写得比较隐晦。如杨万里《上巳》诗曰：“正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秋千日暮人归尽，只有春风弄彩旗。”^①诗文重点对春日的美好风光进行了描写，诗中虽提及了荡秋千一俗，但该习俗在唐代就已经是寒食和清明的节俗活动了。^②“春风弄彩旗”一句暗示了出游人的一天嬉戏热闹的场面，细细回味还有一点上巳节的味道。再如李清照的《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则是叹春光易逝、人生渐老之作。文曰：“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③而贺铸的《梦江南·太平时》：“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香尘扑马喷金衔，浣春衫。苦笋鲈鱼乡味美，梦江南。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④重点抒发了诗人的春日思归之情。

无论是书写春日风光，还是感叹青春易逝、抒发思乡之情都未提及祓禊、踏青之类的“三月三”传统节日活动，也未像唐人那般创造一些新的节俗。可见，三月三上巳节在宋代文人心目中已经只剩下节日名称这个空壳了。虽有一些文学作品对昔日“三月三”的节日活动有所提及但也表达的十分隐晦。如贺铸的《怨三三》：“玉津春水如蓝，宫柳毵毵，桥上东风侧帽檐。记佳节、约是重三。飞楼十二珠帘，恨不贮、当年彩蟾。对梦雨廉纤，愁随芳草，绿遍江南。”^⑤“玉津”北宋首都汴京南门外的一座名园。作者抚今追昔，回忆当年三月三日游览玉津园的情形。从文中隐约可见北宋初年三月三日仕人的踏青游园活动。

从数量上来看，有关宋代“三月三”的文献记载和文学作品的数量已远不如

^① 于北山选注《杨万里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② 张勃《唐代节日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册，第932页。

^④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册，第505页。

^⑤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册，第531页。

魏晋和唐代那么多；从内容上来看，在为数不多的记载或作品中很少提及宋代的“三月三”的节俗活动，可见宋代“三月三”在节俗上既没有创新之处，也未延续前人，“三月三”被宋人日渐冷落。宋以后“三月三”更加不显，“三月三”逐渐消沉。

二、官方对“三月三”重视度锐减

“三月三”的衰落不仅表现在有关文献记载和文学创作的减少，还表现在官方对该节的重视关注度的日益下降。唐朝政府为了表示他们对于“三月三”的重视，将“三月三”社为法定的“三令”节之一，并对百官赐宴赏钱。但是唐之后的宋元朝廷对“三月三”的兴趣日渐降低，并逐渐取消了将重三设定为节假日的旧规。

宋代《文昌杂录》记载了宋神宗元丰五年祠部规定的官员休假状况，宋代的官方节日主要分为三个等级：元日、寒食、冬至，为宋代最重要的三大节，各放假七日；上元、夏至、中元、下元、腊，五节次之，各放假三日；再次是立春、人日、中和、春分、春社、清明、上巳、立夏、端午、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放假一日。^①宋代上巳节官方沿袭唐代的规制，设定了一天的假期。经过辽金时期，至元代，朝廷的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不再提及“三月三”。元元年八月，元世祖颁布圣旨规定：“京府州县官员，每日圆坐参议词讼，理会公事。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贰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公务急速，不在此限。”^②由此可见，元代的岁时活动基本上沿用了汉地的传统习俗，元人的元旦、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七月十五、中秋、重阳、冬至等均为汉族传统节日，但上巳节早已不见踪影。

与唐朝统治者将“三月三”设为“三令节”之一并赐宴赏钱的法律政策相比，从元代不再将重三列为法定节日的情况可以看出统治阶层对三月三重视程度的变化。官方对三月三的关注日益降低也反映了三月三在统治阶层的衰落和消沉。

^①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

^②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卷22《假宁·给假》，中华书局，2001年，第606页。

三、民间“三月三”活动的减少

宋以后,不仅官方不再关注三月三,民间对三月三的兴趣也日益降低。民间的重三活动逐渐减少。

据《中国民俗史》(明清卷)载,明清时期的春季节日除掉春节外主要有:立春、元宵、龙抬头、花朝节、清明节。^①其他学者也指出:“至清则端午、中秋、岁首并称三节。其他若社腊,若正月初七人日,社会久已不知。惟上元有灯火。……三月三日,士流偶有修禊者,市民已不晓其义。”^②宋至清传统节日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地位上升,而三月三再也不是汉唐时代那个全民参与、无人不晓的节日,即使民间偶然举行一次修禊活动,时人也无法理解这一习俗的真正寓意。“三月三”的文化内涵被民众淡忘了。

不仅“三月三”的文化内涵被淡忘了,连节俗也日益分化。《契丹国志》中记载了辽国三月三日骑马射兔的习俗,“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者朋下马跪奉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援杯饮之。”^③契丹族原是以游牧打猎为生的草原民族,所以他们入主中原之后在三月三日中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将骑马、射猎作为节日活动。记载清代苏州风俗的《清嘉录》中记载了三月三日每户人家将荠菜花置于灶台上驱除虫蚁的习俗。^④但无论是“走马射兔”还是“荠菜驱蚁”都与“三月三”传统的祓禊驱疾、高禩求子、曲水流觞等习俗已相距甚远。“三月三”节俗越来越多的融入了地方色彩,传统意义上的“三月三”实际上已经衰落了。

宋之后,有关“三月三”的文献记载和文学创作日益减少,官方对“三月三”的关注度日益降低,甚至不再将“三月三”设为法定节假日,民间“三月三”的节俗活动也日益分化和减少。“三月三”走向了衰落与消沉。

纵观“三月三”的演变轨迹,从先秦的萌芽到汉的成型、到魏晋至唐的兴盛、最后至宋以后的消沉,其节俗演变主要呈现两个趋势:一是由全民祭祀向两性娱乐方向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祭祀活动减退与两性娱乐活动的日益增多。自魏晋始

^① 钟敬文主编、萧放等著《中国民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8-300页。

^② 尚秉和著《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1991年,第376页。

^③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上巳》,四库全书本

^④ [清]顾禄撰《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上巳节俗便开始了娱乐化的道路，从魏晋人的曲水流觞到唐人的踏青郊游，无不体现了时人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积极的娱乐精神。但较之中秋节的歌舞娱乐、元宵节的狂欢性娱乐，“三月三”更多地体现了以两性娱乐为主的特色。无论是祓禊沐浴还是踏青郊游，“三月三”始终都是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的节日。二是“三月三”呈现了由全国性节日向地方性节日演变的趋势。“三月三”自汉代始便是全民参与的全国性节日，唐宋也都将其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范围之内。但是宋之后，“三月三”日益地方化，节俗亦日趋分化，“三月三”在中华传统节日的地位开始下降，并日渐消沉。

第三章 “三月三”消沉之谜新解

宋代以后“三月三”开始走向衰落。那么,究竟是那些原因导致了“三月三”的衰落呢?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研究。有学者通过比较古代中原地区的上巳节和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月三”的演变轨迹,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是决定“三月三”存亡的重要因素。^①也有学者指出宋代以后“上巳节基本上被清明节包容取代”认为宋以后寒食、清明节的兴起是上巳节衰落的重要原因。^②翁敏华教授也曾探讨了三月三上巳节失落的两个原因:一是理学的压迫,二是上巳、寒食、清明三节的融合。^③前辈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三月三”的衰落问题做出了探索与回答,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一个“三月三”的衰落问题我们缺乏更为系统的认识。本章将结合前人的研究与田野调查资料对“三月三”失落之谜进行新的探索。

第一节 关于节日失落问题的思考

关于一个节日的失落问题,我们应该从那些方面进行思考呢?钟敬文先生曾指出“民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事物,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民间许多节日,是包括着经济、宗教、伦理、艺术、技艺等活动。它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④刘晓峰也指出:“中国古代的节日从起源到发展,经常是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⑤节日的复合性特征决定了一个节日的起源与发展、失落或消沉都是多种力量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力量有来自民俗自身的,也有来自民俗活动外部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于节日来讲,民俗内部因素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节日与节日之际的相互融合,二是节日与其它民俗活动的相互影响。

因此,对于宋以后“三月三”消沉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上文中学者们所提到宋代以后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状态(如宋明理学的压迫)

^① 鞠培霞《上巳节与少数民族三月三节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4页。

^② 张丑平《上巳、寒食、清明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③ 翁敏华《三月三上巳节失落之迷初探》,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④ 钟敬文《节日与文化》,引自萧放《岁时——传统中国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

^⑤ 刘晓峰《东亚的时间》,中华书局,2007年,第17页。

等民俗活动的外部因素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民俗活动的内部因素所决定的。对于“三月三”来讲，民俗活动的内部因素又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是“三月三”作为一个节日，节日之间的内部整合，“三月三”与寒食、清明三节的融合，是其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方面上文学者们的观点中也有所涉及；第二层面，较少有人关注到“三月三”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其它民俗活动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很可能是造成三月三消沉的又一重要原因，比如与宋之后日渐兴盛的庙会活动的融合。关于外部因素已经有学者专门进行过论述，以下将重点对内部因素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二节 “三月三”与寒食、清明的融合

在宋代的文学作品中，已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上巳、寒食、清明三节融合的状况。宋穆修《清明连上巳》“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①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宋人清明节和上巳节是合并在一起渡过的。“改火”本是寒食的活动却成了清明节的代表活动，并和上巳“湔衫”活动同时出现了。韩琦《清明同上巳》的“清明池馆足游人，袂褰风光共此辰。晋俗浮觴存胜事，汉宫传腊宠邻臣”^②也说明时人清明节是同上巳节是混合在一起渡过的。另外，杨万里《上巳寒食同日后圃行散》“百五重三并一朝，风光不怕不娇饶”^③的诗句十分明确的指出了寒食和上巳节并在“一朝”。杨万里《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游人不是上坟回，便是清湔褉事来。……女唱儿歌去踏青，阿婆笑语伴渠行。”^④中“上坟”本是后世清明节的主要活动却与上巳的修褉活动同时出现。可见，在宋代三月上巳、寒食、清明三节已经开始融合。

三节的融合一方面与三者节期相近有很大关系。“三月三”自魏晋以来节期一直定在农历三月三日，寒食节节期定于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故又称为“百五节”，而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多紧挨着清明节。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冬至后一百零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⑤而清明节的节期又常与三月三也比较接近，有时甚至会相互重合。例如2011年的4月5日就既是“三月三”

^①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1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12页。

^②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33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07页。

^③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230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492页。

^④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230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492页。

^⑤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卷7，中华书局，1982年，第178页。

又是清明节。另一方面,三节的融合还与唐代以来“三月三”传统节俗的衰落、新节俗的大量产生有关。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上巳节俗不断的娱乐化,祓禊等传统节俗日趋衰落,至唐代,大量趣味性、游戏性很强的新节俗的产生使得传统节俗在时人面前黯然失色。但是,新节俗因其自身的不稳定性没有接替传统节俗成为“三月三”的标志性活动,这样就悄然削弱了“三月三”的独立性。以踏青节俗为例,踏青郊游是唐代“三月三”的新兴节俗,也是唐人“三月三”最喜爱的活动,但踏青活动并未固定于三月三日,在春天的其它时期也可进行。这样就为踏青也成为清明节的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样,唐代上巳节热闹的竞渡活动也成为了后世端午节的主要活动。唐人不拘一格的开放心态促进了唐代节俗的不断丰富但同时也使得三节(“三月三”、寒食、清明)的节俗活动也日趋开放,最终走向相互融合。

从宋代开始,“三月三”、寒食、清明三节节俗的融合,加之宋之后清明节的兴盛是宋以后三月三衰落的一方面原因。

第三节 “三月三”与庙会文化的融合

除了与寒食、清明节的融合外,“三月三”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与庙会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梦梁录》里的疑问

在宋代吴自牧《梦梁录》里“三月三”条中除了“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之类对前人“三月三”活动的追慕外还有这样的记载:

兼之此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务,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公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诸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者纷纷。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杭城事圣之虔,他群无也。^①

上文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三月三日佑圣道观热闹的香火、“社会”活动。

^① [宋] 吴自牧,《梦梁录》,卷二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佑圣”全称“北极佑圣真君”，也称“佑圣真君”，即“玄武”。^①玄武也称“真武”，属道教神。为何在《梦梁录》里关于“三月三”的记载中除了对前人“三月三”活动的追思与爱慕便是对玄武诞辰这样的道教庙会活动的描述？“三月三”与庙会活动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一定的联系呢？

二、我国的庙会文化

庙会是指“围绕着庙宇所发生的群体性信仰活动”。^②其‘硬件’是庙宇，其‘软件’是祭祀行为。我国庙会文化具有极为漫长的历史。先秦时期已经有“稳定、单一”的庙会形态存在，汉代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使得庙会文化开始向“多元性多层次性方向发展”^③，并且呈现出空前繁盛的局面。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战乱等社会状况使得的庙会文化在民间宗教信仰的普及等方面得到了发展。隋唐统一后，庙会文化得到了更为充足的发展，祭祀、娱神的形式不断丰富与庙市活动的相继出现促进了庙会文化的长期稳定发展。唐之后，宋代的庙会文化进一步发展并且出现了又一次的大繁荣。在庙会的发展史中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后期庙会开始与许多节日紧密联系起来。高有鹏在其《中国庙会文化》中指出：“庙会在唐代后期不但扩大了庙寺道观的规模，而且与许多固有的民间节日更紧密的联系起来，这种相混相生的现象使庙会更稳固”。^④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从西域传入的佛教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纷纷举办庙会活动，至唐末各教为了使自身的地位更为稳固，选择了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节日相结合，甚至将民间节日日期定为庙会日。唐末至宋庙会与节日的结合日益紧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三月三走向了衰落。

三、具有上巳遗风的涉县娲皇宫庙会

除了古籍中的记载外，现今农历三月河北涉县娲皇宫所举办的娲皇庙会也是“三月三”与庙会文化融合的典型例证。

河北涉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西与山西搭界，南与河南为邻。该县

^① 栾保群著，《中国神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0 页。

^② 高有鹏著 刘锡诚主编《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 页。

^③ 高有鹏著 刘锡诚主编《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9 页。

^④ 高有鹏著 刘锡诚主编《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50 页。

历史文化悠久，古属冀州，汉代始置沙县，后改称涉县，宋元时期升为崇州，后称涉县至今，今属河北省邯郸市管辖。^①当地女娲信仰浓厚，2006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同年，涉县的“女娲祭典”也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传说农历三月十八是娲皇奶奶（女娲）的诞辰，因此每年的三月初一到二十民间在娲皇宫举行庙会祭祀女娲。该庙会历史悠久、规模盛大，庙会期间还有朝顶、坐夜等大量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并且，通过考察发现涉县娲皇宫庙会与古代上巳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庙会日期与上巳节期

涉县娲皇宫于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到二十举办庙会活动。这一日期恰巧涵盖了古代上巳节举办日期。上巳节自汉代始便以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为节期，虽说每年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并不固定，但大体上保持在三月的上旬或中旬。到魏晋以后节期固定于农历三月三日，但依旧涵盖在娲皇宫庙会的节期之内。可见，涉县娲皇宫庙会的会期和古代“三月三”的节期是非常接近的。娲皇宫庙会以初一、十五为最重要的日子举行祭祀活动，而未选择三日想必是与道教注重初一、十五的传统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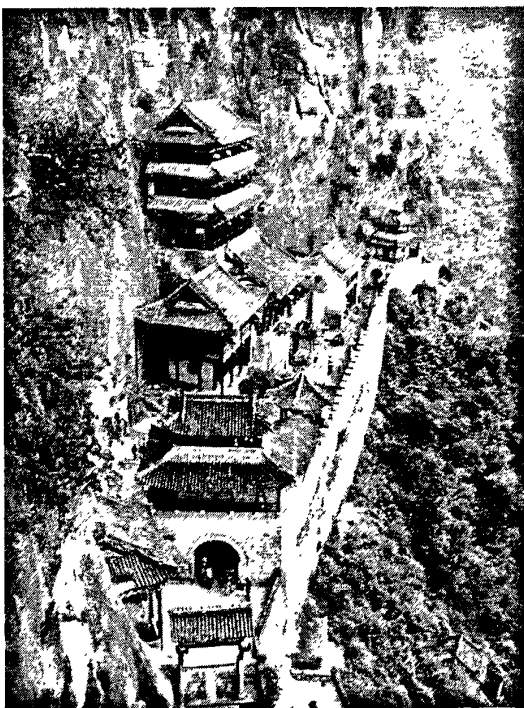
（二）、祭祀对象与祭祀目的

两者在祭祀对象上具有一致性。涉县娲皇宫庙会主要的祭祀对象是具有补天、造人、置婚姻等创世功绩的人类始祖女神——女娲。娲皇宫里的主神即为女娲。悬挂于半山腰的娲皇阁是娲皇宫里的主体建筑。（如图一所示）娲皇阁从下到上依次分为清虚阁、造化阁、补天阁三层，每层阁楼中各自供奉着姿态迥异的女娲神像，精美的壁画上分别描绘了“纣王进香”、“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等民间故事。山上咸丰年间修建的牌坊上赫然写着“娲皇古迹”四个大字。清代邑令杨以兼《重修娲皇阁记》中载：“史传女娲氏炼石补天之缺，雪航赵氏疑为不经。窃惟洪荒初启，娲皇于其时正婚姻，止滔水，作笙簧，殄共工。……天地文

^① [清] 涉县县令威学标主持修撰《涉县志》卷一“疆域·沿革”条，嘉庆四年二月刊。

明之运自此而开”。^①另外，涉县民间还有专门祭祀女娲的朝顶仪式。无论是文字记载、文化古迹还是当地的民俗活动皆表明涉县娲皇宫的祭祀对象是女娲。

我国古代上巳节的主要祭祀对象是高禖。因神坛多设于水边的高地，“高”通“皋”，所以高禖也称“皋禖”。宋代罗泌《路史·后纪二》载：“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禖，因置婚姻。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闻一多也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云，夏人所祀之高禖为涂山氏，即女娲；殷人所祀之高禖为简狄；周人所祀之高禖为姜原，由此可见，女娲为最早的高禖神。^②如今山西省河津市高禖庙供奉的女娲



图一 依山而建的女娲宫

(来自百度图片)

也说明女娲至少是我国古代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高禖神。^③清涉县县令杨以兼《重修娲皇阁记》中载：“邑西二十里许有神庙焉，创建之故，世远难稽。土人做古郊禖之意。季春之月，相率祈禳于此，各得其所欲愿。”^④由碑记看来娲皇庙的初建目的由于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考证，但当地人认为娲皇庙是古代用来祭祀“郊禖”的场所。毛亨曾在《诗经·商颂·玄鸟》及《大雅·生民》中指出“高”古读作“郊”，指郊天之祭，所以高禖又写作“郊禖”。因此，“郊禖”即高禖。如此说来，涉县娲皇宫庙会的祭祀对象便与古上巳节的祭祀对象是一致的，同为高禖。

^① 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涉县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第963页。

^②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清河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5年04期。

^③ 闫爱武《女娲与高禖神——从河津高禖庙说开去》，运城学院学报，2005年06期。

^④ 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涉县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第963页。

涉县娲皇宫庙会与上巳节的祭祀目的是一致的。高谋求子是我国古代上巳节的三大古老活动之一，上巳节祭祀高谋的主要目的是求子，像临水浮卵、浮枣等上巳节俗也蕴含着浓烈的求子意图。而涉县娲皇宫庙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也是求子。娲皇宫里的货摊上除了香蜡等祭神用品外最多的就是娃娃了，各式各样的塑料娃娃（如图二所示）。娲皇宫里女娲的神像前也堆满了各种塑



图二 庙会上的娃娃

刘芬芬 摄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

料娃娃。为何如此多的娃娃？凡是去过娲皇宫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求子用的。据当地人陈水旺^①讲，旧时求子用的是泥娃娃或布娃娃，求子的妇女多在婆婆或嫂嫂的陪伴下来到娲皇宫，如果想生男孩，就要在烧香上供默念之后，在男性泥娃娃的的生殖器上扣一小块泥巴吃下去，认为如此便可以生男孩，当地称此俗为：“吃子山”。除“吃子山”外还有一种求子方式——拴娃娃。在娲皇圣母像前，人们根据自己生男生女的愿望，用红绳套在一个娃娃的脖子上，用红布把娃娃包起来揣在怀里，或者放在篮子里，叫着自己事先取好的名字，不回头的往家里走，到家后放在床角或柜子里。等生育之后还要到娲皇圣母面前去还愿，感谢她赐予后代。还愿时要把当初的娃娃用红布包着还回去，并且生儿子要还两个回去，生女儿还一个既可。如今当地人们求子多采用拴娃娃的方式。无论是旧时的“吃子山”还是流传至今的“拴娃娃”都显示出明确的求子意味，与上巳求子的目的不谋而合。

（三）、庙会活动与上巳古俗

涉县娲皇宫庙会上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既有有进香、烧纸、系红布、撒小米等常见的拜神习俗，也有唱愿戏、唱经歌、打扇鼓等娱神活动，但总体来看其主要活动包括三项：规模盛大的朝顶仪式、神秘独特的坐夜习俗、种类繁多的求子活动。其中，朝顶仪式是祭祀最早的高谋神——女娲的主要活动，祭拜女娲的

^① 陈水旺，男，1945年生，涉县井店镇台北村人，高小文化，1981年开始在娲皇宫工作至今。

主要目的之一是祈求子嗣,拴娃娃等求子活动生动展现了涉县当地丰富多样的求子习俗。朝顶仪式与求子活动与我国古代上巳节祭祀的高谋求子活动异曲同工。

1、朝顶仪式与高谋求子

涉县娲皇宫朝顶仪式是涉县娲皇宫周围村民自发组织的规模盛大的女娲祭祀活动。它是涉县老百姓祭祀女娲的最高仪式,也是庙会上最为重要的活动。“顶”即娲皇宫所在地,当地俗称“奶奶顶”,“朝顶”即朝拜娲皇宫之意。当地以“社”为单位进行朝顶,一个“社”可以是一个村子,也可以是几个村子的联合体。这些“社”统称“娲皇社”。娲皇社的主要职能是举办迎送娲皇圣母的民间祭祀活动。朝顶活动规模盛大,所有参加朝顶的人员皆着古装,以锣鼓令旗开道,中间四人抬风辇,丫环、侍女、表演人员等随后,队伍庞大,少则三五百人,多则上千人,场面甚为壮观。热闹隆重的朝顶仪式是涉县百姓祭祀女娲的最高仪式,而女娲又是我国古代的最早的高谋求子。

2、坐夜与“会男女”之俗

涉县娲皇宫庙会上还有一个奇特的民俗事象——坐夜。庙会期间,男女老少可以晚上不回家在山上陪老奶奶(即女娲)坐一个通宵,俗称坐夜。庙会期间夜晚娲皇宫的热闹气氛一点也不比白天差,尤其是三月十五的前一天晚上。那些天里,娲皇宫山下的广生宫内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来坐夜的人千姿百态,有唱的,有跳的,有哭的,有笑的,有坐着的,有躺着的,有闭目静思的,也有东张西望的。有的人生活中遇到了不如意的事便借机向娲皇奶奶痛痛快快地哭诉一番,有的看似比较高兴就给娲皇奶奶扭秧歌、唱个小曲。一些神婆、神汉会为娲皇奶奶表演打扇鼓之类的祭神节目,有时也会借神附身之名,说出一些莫名的话或随意的手舞足蹈,达到某种语言与行为的放纵与狂欢。

何以会有如此奇怪之俗?据说,旧时在坐夜的晚上,媳妇可以不受婆婆或母亲的约束,也可以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她们可以借此机会与不相识的陌生男子交往。因一夜野合而使长久不孕的妇女怀孕的事时有发生。旧时在娲皇宫的西侧半山腰,还有一座小庙,庙中有一对被红布盖着的裸体男女交媾的塑像,不孕妇

女常在守庙人的指点下去掀布观望，从而增长生育知识。^①也许这才是好多妇女到娲皇宫求子成功的真实原因。坐夜习俗为男女交往提供了众多有利的条件，青年男女们可以借陪神之名大胆相会。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上巳节也有“会男女”之俗。无论是《周礼·地官·媒氏》云：“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禁”的政令，^②还是《诗经·郑风·溱洧》中对古代郑国男女于上巳日在溱河、洧河边上互赠爱情信物、相互挑逗戏谑的情形的描绘，都是古代上巳节热闹奔放的“会男女”之俗的表现。坐夜与上巳节的“会男女”之俗两者虽然在形式上有一些差别，例如古代上巳节男女相会于水边而涉县娲皇宫庙会上的男女相会于山上，但是两者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受时代文化的制约上巳节的男女相会活动更直接一些而娲皇宫庙会上的坐夜活动表现得更隐晦一些罢了。

无论是古代上巳节“令会男女”的习俗还是娲皇宫的坐夜习俗都是为男女相会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通过这一契机可以脱离常规的束缚而实现男女两性的自由交流。从这一角度上讲，坐夜与“会男女”习俗在目的与功能上都是一致的。

3、洗手之俗与水滨祓禊

除此之外，在娲皇宫还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习俗——洗手。（见图三）在娲皇宫子孙殿前面的卖香蜡五色纸等敬神用品的小货摊上还都经营一项独特的买卖——洗手。地上放一个简单的脸盆，里面盛一些水，洗一次手，收取一元到几元的费用。问摊主为何要这样做，几个摊主说这样做取吉祥平安之意，并且说是个“老规矩”。山下弹音村的村民汤自元老先生^③告诉笔者此俗一方面为远道而来的人清洁



图三 娲皇庙会上的洗手活动

刘芬芬 摄于2010年4月26日

^① 杨荣国、杨清华《女娲庙会上的女娲信仰》，选自杨荣国主编《中国女娲文化首届高层论坛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② 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③ 汤自元，男，涉县弹音村村民，1935年生，高小文化，曾多次担任弹音村娲皇社的香芳。

之用,一方面确实有祈求吉祥之意。并且说山上取水不便,许多货摊的水都是摊主远道从自己家挑来的,所以要收取一定费用。据说旧时洗手的人挺多,不为清洁,也不真洗,只是意思一下,求个吉祥。

上巳被褻习俗古已有之,并且是一种在水边沐浴盥洁祓除不祥的一种古代祭祀仪式。值得注意的是,被褻活动中“沐浴”的概念是十分广泛的,并非一定是指从头到脚全身的洗濯,洗手、洗脚等清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的活动也可以包含在“沐浴”活动范围之内。晋成公绥就曾在其《洛褻赋》曰:“……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壘尊,飞羽觞。”^①可见,古代被褻时早已有“盥纤手”“濯素足”这样的洗手、洗脚风俗。有少数民族学者也曾指出三月三这一天“去井边、河边洗脚,这就是水滨被褻习俗。”^②那么,可以将洗手看成被褻的一种简化方式。

一个是河边洗澡、一个是脸盆洗手,一个是祈求吉祥、一个是祓除不祥,形式与内容上是如此相似,目的与功能上又是如此相近。那么为何被褻的内容会由洗澡变成洗手呢?一方面涉县山多水少,就像此地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将男女相会的地点由水边移至山上一样,被褻的内容也随之由水边沐浴变成了山上洗手,这是被褻习俗与当地自然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另一方面被褻本质上是一种洁净除恶仪式,洗手、洗脚等清洁活动完全符合其本质,自然也应包含其中。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洗手习俗是水滨被褻习俗因地制宜的一种历史演变。现今娲皇宫庙会上洗手的游客似乎很少,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现代人无法理解为它的真实含义,只将其看做商人敛财的一种方式缘故吧。

涉县娲皇宫的朝顶仪式、坐夜、洗手三项习俗与上巳节水滨被褻、男女相会、高谋求子三大古老节俗活动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涉县娲皇宫庙会具有庙会的称谓与形态,但其在举办日期、祭祀对象与目的、主要习俗活动内容上却与三月上巳节极为一致,因此,涉县娲皇宫庙会是庙会文化与三月上巳节日文化的几千年融合的产物。

另外,与涉县娲皇宫庙会情况相似的还有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女娲庙会以及河南省淮阳县人祖庙会。两者也皆有三月三文化与庙会文化的融合的印记。西华庙会的时间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二至二十日,也是以女娲为祭祀对象、以求子活动

^① [清]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59,中华书局,1958年,第1795页。

^② 谭桂清《“三月三”源流考》,民族艺术,1994年第1期。

为主要内容。庙会期间有守功的习俗，即庙会期间女子住在庙中，以表示对女娲的虔诚，这与涉县娲皇宫庙会中的坐夜习俗颇为相近。^①河南省淮阳县人祖庙会，会期为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祭祀对象为伏羲与女娲两人，其旧时节俗中也有通过野合的向神求子的习俗，以及摸子孙窑、拴娃娃等求子习俗。有学者通过其主要习俗中表现出的浓烈生殖崇拜、女神崇拜意味推测此处的主神早先应是女性神女娲，后来演变为伏羲。^②西华女娲庙会与淮阳人祖庙会都与祭祀女娲有关，都有形式多样的求子活动，都和涉县娲皇宫庙会一样是具有三月三文化与庙会文化的融合的印记。

“三月三”的衰落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有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状况等外部因素，有与寒食清明相融合的原因，但宋以后日趋兴盛的庙会文化与“三月三”文化的融合很可能是中原地区“三月三”走向消沉的又一重要原因。

^① 张翠玲《西华女娲城庙会调查报告（上）》、《西华女娲城庙会调查报告（下）》，民俗研究，1996年02期、03期。

^② 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再推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至第149页。

第四章 “三月三”的现代传承与创造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之后,“三月三”虽不再像古代那般热闹繁华,甚至日渐消沉,但“三月三”并未绝迹,至今,在我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仍有“三月三”的习惯。不仅如此,国外日本、韩国的部分地区在每年的“三月三”日也有一些特别的节俗活动。除了现今留存下来的“三月三”节俗外,一些有识之士大胆创新,在传统“三月三”节日活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对“三月三”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上海师范大学女子文化学院的“三月三·女儿节”便是这样一个经典案例。

第一节 “三月三”现状分析

如今,我国仍有不少地区以农历三月三日为节。“三月三”主要分布在我国中南、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部分汉族地区在三月三日也有一些独特的节俗活动,但整体来说,无论是活动的规模还是节俗的丰富性都远不及少数民族地区。国外的“三月三”主要分布在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

一、我国少数民族的“三月三”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月三”主要分布在广西的壮族、侗族、瑶族,海南的黎族,浙江丽水的畲族,贵族的布依族、苗族等地。这些地区皆以“三月三”为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并且节日活动十分丰富。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三月三”的节日活动规模盛大且热闹非凡,主要以恋爱为主题,有对歌、拜神祭祖等节俗活动,并且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和保护。

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月三”规模盛大、场面壮观,热闹非凡。广西壮族的“三月三”歌圩是他们除春节和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鬼节)以外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举行对歌时,方圆数十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皆身着节日盛装前来参加。届时,人山人海,歌声此起彼伏。青年男女们在景色秀丽的山坡上对歌、抛绣球、碰彩蛋、演壮戏,好不热闹。黎族“三月三节”是海南黎族百姓最盛大的民间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各县、镇、乡、村都要举行隆重的欢庆活动。青年男

女们白天通过对歌互诉真情，夜晚则在篝火旁载歌载舞，场面甚为壮观。

少数民族的“三月三”主要以青年恋爱为主题。黎族“三月三”节又称爱情节，是海南黎族青年的好日子。^①黎族主办者将三月三的节日会场设在开阔的橡胶林里，头上绿叶遮天，脚下铺满了柔软的叶子，环境幽邃安谧，为青年男女寻找伴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不仅如此，在活动中，青年男女祭拜完祖先之后，一起欢度节日。在欢快的箫鼓乐中，小伙子纵情欢跳，引吭高歌，姑娘们则躲在绿树丛中，手持一种当地称为“布任”的香树枝叶半遮面，窥视情人。相中后，男女双方可以通过对歌互诉心曲。入暮，青年男女一起在篝火旁载歌载舞，情投意合者则成双成对的隐进丛林，并互赠爱情信物——香草，订下终身。直到拂晓时分才依依惜别。广西壮族“三月三”有碰彩蛋的习俗。在歌圩中小伙子手握彩蛋去碰中意的姑娘手中的彩蛋，姑娘如果把蛋握住不让碰便表示姑娘不愿意，如果姑娘让小伙子碰彩蛋便标志比较中意。蛋碰裂后两人共吃彩蛋，以示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在少数民族“三月三”的节俗活动中类似的习俗还有很多，皆反映了“三月三”的恋爱主题。

现今少数民族的“三月三”以对歌、祭祖为主要活动。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常以对歌为三月三的主要活动。无论是壮族、黎族、还是侗族、苗族几乎都有对歌的习俗。(如图四^②)壮族“三月三”的歌圩活动被当地人视为是传统的歌节。^③壮族人民赛歌、赏歌，男女青年则以歌传情，通过对歌寻找意中人。浙



图四 黎族青年男女对歌

江丽水畲族“三月三”也每年举办歌会。当宾客在用膳时，热情的畲族主人便在

^① 王静：《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9)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新东方》，2009年03期。

^② 图片来自：王静《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9)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新东方》2009年03期。

^③ 赵丽《广南壮族“三月三”歌圩》，民族音乐，2007年06期。

一旁唱起敬酒歌,欢迎远方来的客人。在歌会会堂里一排排男女拉开阵势,以歌相对,一唱一和,通宵达旦。女歌手声音清婉嘹亮,男歌手则高亢雄浑,歌词自然合韵、语意双关,并蕴含着浓浓的情意,让听着久久难忘。^①除了对歌外,许多少数民族在三月三日这一天还有拜神祭祖的习俗。黎族青年男女在三月三日这天要先携带着提前准备好的山兰酒、晒干的腊肉、糯米米粳等物品到当地的娘母峒前祭拜祖先。三月三日这天,壮族各家要准备数十斤酒肉和成担子的糯米上山祭祖拜神。^②除了对歌和祭祖两项主要的活动外,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还有抛绣球(广西壮族)、吃乌米饭(浙江畲族)、吃荠菜煮鸡蛋(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等丰富多彩的节日习俗。

如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月三”,节俗活动丰富多样、场面壮观,既有传统三月三的文化因子,同时又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三月三”风情。如今,少数民族的三月三日益受到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保护。198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将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日确定为黎族的传统节日,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将“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983年“广西壮族‘三月三’歌圩”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确定为壮族的全民性节日,同样于2006年5月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浙江温州泰顺县的“畲族三月三”被列入温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贵州省惠水县的“布依族三月三”被列入省级第三批国家非遗名录。可见,“三月三”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与保护。

二、我国汉族地区的“三月三”

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一些汉族地区也有一些独特的“三月三”节俗活动。总体来看,我国汉族地区的“三月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或融入到各地的民间文化中,或消沉在历史的海洋里,保留有明显的“三月三”习俗的地方到现在已经为数不多了。

如今,在山西洪洞、浙江新叶、安徽桐城等汉族地区在三月三日这一天有一些节日活动。山西省中南部洪洞县“三月三”有“接姑姑”的走亲习俗。每年农

^① 蓝余生《三月三畲乡歌会》,浙江档案,1996年07期。

^② 张国军、李慧《壮族“三月三”民俗文化旅游的营销思考》,市场营销导刊,2008年06期。

历三月初二到三月初五日期间羊獬村要组织迎神队伍到历山迎接娥皇、女英两位姑姑^①。当地传说尧居于羊獬村，舜居于历山，尧王为了考察舜的能力，将娥皇、女英两个女儿嫁给了舜，每年三月三尧的两个女儿回来走亲戚，羊獬村便组织迎神队迎接。洪洞羊獬、历山等地的尧舜文化历史悠久，因此，当地的“三月三”不可避免地有了尧舜文化印痕。除了山西洪洞外，浙江新叶村的“三月三”活动也比较古老。据师姐王之涵调查，浙江省建德县新叶村三月三日有迎神（关羽、白山大帝、周宣灵王）、祭祖、赶集、社戏等民俗活动。^②另外，安徽桐城“三月三”有食蒿粿的传统习俗。^③蒿子，俗名耙蒿，属草本植物，叶面呈绿色，叶底微白带绒毛。入春后，生长于田间地头、山坡河岸。每年三月三日前后，桐城的年轻姑娘们成群结队的拎着篮子到山上采摘刚冒新芽儿的蒿子，场面十分壮观。将嫩蒿采回去之后先清除杂物、摘捡干净，然后经过漂洗、捣碎、浸洗、挤去涩汁等一系列工序后，和入糯米粉，再按个人口味加入腊肉丁、盐、切碎的姜、蒜等佐料，做成圆饼形状的耙耙。或用蒸笼蒸、或用平锅焗皆可，冷热均可食用。这种略带植物清香的绿色蒿粿，甜美可口，颇具地方特色。

较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地区保留有“三月三”习俗的地方较少，且节俗十分零散，多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不像少数民族那样具有统一的主题，大体一致的节俗活动。

三、邻国“三月三”概况

现今与我国临近的日本、韩国等地皆有“三月三”习俗。其中，日本的“三月三”活动较为丰富且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做得较好。因此重点对日本的三月三活动进行考察。

日本的“三月三”称为“女儿节”，也称“桃花节”，日语称“雏祭”。在这一天除了品尝樱花年糕、方块糯米糕、草年糕、散花寿司、凉拌酱醋贝、蛤蜊清汤等美味节日食品外，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节俗活动——摆放偶人。（如图五^④）

三月三日这天，有女孩的人家要在家中陈设偶人陈列架，架上摆满偶人，为家中女孩祈求赐福。偶人陈列架主要有七层，由上到下，第一层摆放亲王夫妇、

^① 程安霞《“三月三接姑姑”走亲仪式活动田野考察报告》，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② 王之涵《新叶村三月三日节的文化考察》，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 叶良《桐城“三月三”食蒿粿之俗的考察》，社会纵横（新理论版），2010年第3期。

^④ 图片来自：苏亚梅《日本女儿节偶人》，载于《世界文化》，2008年07期。

第二层摆放三名宫女、第三层摆放五名奏乐者、第四层放置两名手持弓箭的侍卫、第五层是三位杂物随从、最下面二层则摆放生活物件（梳妆镜、轿子、避邪的桃花之类）。整套偶人由十五个单独偶人组成，一般价值五十万日元左右，价格不菲。偶人一般由外祖家馈赠，并且日本人认为女孩会将自身的不祥转到偶人身上以保证女孩自身健康成长。^①

除了在家中陈设偶人外，日本一些地方还有“流雏”的习俗。在福島县三岛町，当地的女孩们会自制与家中女性成员人数相等的纸偶，并在三月三日将之摆放在偶人架上。第二天（三月四日）下午，附近的男孩会把女孩子家中的纸偶收集到木箱子中，随后，女孩子及其母亲跟随收集纸偶的人一起来到河边，将木箱子投入河中，使之随波漂走。在鸟取县用瀬町，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会举行“流雏”仪式。当地要事先准备一种用草编织的圆垫子，垫子上摆放偶人夫妇。女孩子要向事先准备好的偶人吹气，寓意将自身的不洁之物转移到偶人那里，然后将偶人和圆垫一起放入河中漂走。日本人相信，这样会使她们自身的不祥随波漂走。



图五

日本的“三月三”节俗最早是以唐之前从中国传入的曲水宴为中心内容的，后来到江户时代，发展成为以雏祭为主要活动的节日。^②而雏祭又分为在家中摆放偶人（俗称“坐雏”）和“流雏”两类。由三月三“雏祭”衍生的偶人文化如

^① 邱雅芬《日本的偶人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载于《日本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李心纯《从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到日本的雏祭》，载于《日本学刊》1996年02期。

今已经成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那些精湛的偶人制作技艺、蕴含着它们民族历史的华丽偶人以及成为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傀儡戏——“人形净琉璃”^①,都是日本偶人文化强劲生命力的表现。通过研究日本“三月三”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日本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生活,不仅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继承发扬还使得他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愈发强劲的生命力。他们使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并行不悖,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节 “三月三”个案研究

——以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为例

面对我国日渐衰微的“三月三”文化,对比日本保存完好三月三“雏祭”,身处传统文化淡漠的都市、置身于充满活力的大学校园的我们能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做些什么呢?如何才能将传统“三月三”文化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呢?上海师范大学翁敏华教授等有识之士大胆创新,将传统“三月三”文化引入了大学校园并创办了“三月三·女儿节”。

一、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

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创办了“三月三·女儿节”,从此翻开了现代都市“三月三”的新篇章。“女儿节”不仅重拾了失落的中华“三月三”文化,还赋予了这个节日新的时代意义和使命。此后“三月三”在节日活动方面不断进行创新,2008年它走出校园,发展壮大为“东方女儿节”。此后,“上海东方女儿节”不断推陈出新,2010年又创办了首个数码网络版“东方女儿节”,借助网络这一新的平台让三月三“女儿节”走得更远。

(一)、女儿节的创办:抢救非遗、应运而生

上海师范大学“三月三·女儿节”的创办并不是个偶然,它的产生是时代的呼唤。2002年,我国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随后,全国开始对濒

^① 所谓人形净琉璃,即操弄偶人进行表演的傀儡戏,是深受日本人喜爱的表演艺术。与能乐、歌舞伎并列为日本三大传统剧种之一。

危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记录、整理、出版和保护工作,^①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②、《戴着面具起舞:中国傩文化》^③、《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口头遗产文化空间》^④等民间文化书籍。2004年,正当我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时,传来了韩国要将“端午祭”申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这一消息传到中国之后,顿时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国流传上千年的传统端午文化竟然成了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禁令人扼腕叹息。甚至有人喊出了“保卫端午”的口号。

基于以上社会背景,更基于三月三文化日渐衰微的现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和多年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副院长翁敏华教授提出将学院的五周年院庆与4月11日的“三月三·女儿节”合在一起举办,并从此把每年的三月初三日定为了学校的常规性纪念日。这一创举在当时引起了上海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纷纷报道了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的盛况。^⑤

2005年4月11日,上海各界女性代表、民俗专家及全校的女生、女教职工参与了这次新颖独特的“女儿节”活动。那次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女儿节’与当代大学使命”学术研讨会、“我是女生”演讲赛、“女生形象设计展”、风筝会、大型篝火会等系列活动。这边是古香古色的茶道表演,那边是亦中亦西的时装秀,还有那一百多名身着泳衣手持玫瑰进行水上游戏的靓丽师大女生们……真是令人目不暇接。整个活动既充满了青春浪漫气息又融合了众多古典元素。

^① 张稚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回顾》,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2005年11月30日。

^② 冯骥才主编《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刘芝凤著《戴着面具起舞:中国傩文化》,中国(贵州)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 陈勤建编著《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口头遗产文化空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⑤ 《新民晚报》2005年4月6日A4版刊登了曹奕的《“女儿节”到了回归中国的时候》一文,同年4月12日9A版有发表了曹奕《手系女儿结 相约三月三》一文,2005年4月7日第6版的《文汇报》也发表了何连弟的《上海师大重拾传统“女儿节”》一文,此外还有许多媒体对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进行了报道。

(二)、女儿节的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三月三·女儿节”创立之后，不断地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使得“女儿节”不断的发展壮大。

“女儿节”创办之后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06年的“女儿节”，同济女子学院就专门派了师生代表前来参加。2007年的“女儿节”以“我是好女儿”为主题，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组织策划了“女儿当自强”——女大学生人生规划专题研讨会、“女儿好风采”团队争霸大赛、“女儿真性情”踏青游乐活动、“女儿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我是好女儿”主题庆典及晚会等大型主体活动。活动内容不断创新、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的目光。

2008年是“女儿节”快速成长的一年。这一年，在上师大女子学院与上海道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通力合作下，“女儿节”走出了校园，发展壮大为上海“东方女儿节”，成为了上海市的大型社会节庆活动。08年的上海“东方女儿节”推出了一整年主题健康、形式生动的校园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吸引了众多热爱传统文化、热爱美好生活的人们参与其中。08年的东方女儿节活动共分“德、才、美”三个分主题，分别是：以反映东方女子之“德”的大型征文暨2008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以反映东方女子之“才”的上海民间女子工艺作品创新大赛活动，以及以反映东方女子之“美”的“母亲河·女儿船”大型女性文化主题巡游活动。当年女儿节组委会还在上师大举办了“女子成人仪式”暨上师大女子文化学院2008“三月三·女儿节”的主题庆典，以及“心灵手巧好女儿——女儿作品展”活动，正式开启了08年的“东方女儿节”。

2009年的女儿节通过与社会知名人士、专家、专业人员的合作，使得东方女儿节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反响。09年3月29日以“好女儿与世博同行”为主题在长风生态园举行了09年“东方女儿节”的开幕仪式。这次“女儿节”首次在国内推出“女儿祈福礼”，请著名女作家等成功女性投放祈福瓶。祈福瓶顺流而下，以寄托传东方女儿们对世博的美好祝愿。同时还举办了以旗袍为载体的“花样履痕——上海女性生活艺术沙龙”，展示20世纪2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海派时尚旗袍。著名女作家林华、程乃姗等出席并主持了沙龙活动。在09年的东方女儿节系列活动中，主办方还与奉贤油菜花节进行了对接，使得活动更具延伸性。2010年推出了中国首个数码网络版“上海东方女儿节”，借助网络这一新

的媒介让三月三“女儿节”走得更远。在为期这一个半月的活动期间,逾2万名网友积极参与了名媛荟网站上的多种活动,他们都从中感受到了“东方女儿节”的传统韵味和创新魅力,并亲自参与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来。

纵观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六年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女儿节”在不断的创新中逐渐发展壮大。

(三)、女儿节的特色:女性主体、糅合古今

上师大创办的“三月三·女儿节”,形式新颖、活动丰富,让许多当代的年轻女性亲身参与并体验了我们传统的节日。在节日活动方面,女儿节对一些传统活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将古典文化以现代的形式展现,使得传统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突出女性主体、糅合古今文化是“女儿节”的两大特点。

上师大“女儿节”从05年创办至今一直坚持以女性为主体,突出女性在这一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女性是女儿节活动的主要参与者,05年女儿节参与者为上师大全校的女生、女教职员和上海各界女性代表、民俗专家。其中,女性占到绝大多数。08年随着上师大“女儿节”发展为上海“东方女儿节”,参与者也随之扩大,众多优秀的女性文化人士以及上海数万在校女学生和在职女性白领参与到了活动中。但无论参与者如何扩大,女性总占据着最大的比例。

“女儿节”的活动也基本上都围绕女性展开。在活动主题方面,女儿节自05年创始之时,便是和女子学院院庆一起合办的,女性主题不言而喻。07年以“我是好女儿”为主题,08年东方女儿节通过“德、才、美”三个分主题展示中国女性贯穿古今的优良品质,09年以“好女儿与世博同行”为主题,女儿们为上海世博会祈福,祝愿世博会成功举办。在具体的活动内容上更加突出了以女性主体。很多活动都是为专为女性设计。女学生学生们亲手剪制窗花布置“闺房”(寝室)、亲自准备女儿餐。除此之外,还有女性形象设计活动、女性风采展示活动、女性文化旅游活动以及一些关注女性自我完善的讲座、论坛等活动。这些活动给予现代女性更多的人文关怀,使她们更加自信、自强。

将女性作为节日主体,实际上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我国的许多节日都具有浓重的女性色彩,上巳、端午、七夕、重阳都曾有“女儿节”之称^①。中国的女

^① 赵伟含《中国传统女儿节探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性在传统节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女性既是节日的主参与者,又是节日的主要传承者,女性与节日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上师大创办“女儿节”,以女性为主体,也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种重塑。

除了突出女性主体地位外,“女儿节”还有一大特色,即糅合传统元素与现代文化。在继承我国传统节日精神的基础上将古老文化以现代形式展现,或在现代的节日活动中融入一些古典元素,既使得传统在现代得以传承又使得节日活动符合了现代人的需求。05 年的水上游戏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古代三月三有水滨祓禊的习俗,三月三日这天全民要在水边沐浴以驱除疾病和不祥,到魏晋又兴起了曲水流觞等水上活动。05 年上师大的“女儿节”也继承了古人三月三的亲水传统,精心设计了专业级游泳比赛、菜鸟级游泳比赛、女儿球比赛、寻绣球比赛、芙蓉戏水等五大项目的活动,将集体沐浴改为群体游泳比赛,不仅继承了古人上巳亲水的传统,也符合了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增强了可操作性。在五项水上活动中“芙蓉戏水”活动最有趣,女生们人手一枝象征美好青春的玫瑰花,跳进水池中戏水,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最后还将玫瑰花瓣撒在了游泳池里。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人的香草沐浴之俗,想起了《诗经·溱洧》中青年男女在溱水洧水边相互嬉戏、互赠芍药的情形。古代的水滨习俗进行了生动的现代演绎。

除了水上活动外,还有许多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了“女儿节”活动中,像茶道、旗袍、剪纸、女子成人礼等等。随着我们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面临着被现代生活所淹没的危险,传统与现代似乎永远势不两立、水火难容。难道就没有办法让传统与现代和谐相处吗?“三月三·女儿节”就开辟出了这样一条糅合传统与现代的道路。

二、校园文化空间的创立

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业名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文化空间”是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一定区域的人、

特定的文化活动以及一些特定活动设施是文化空间不可或缺的三要素。^①文化空间是一个载体,“是有形的群体文化活动的载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环境,是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②

虽然如今的“女儿节”已经走出了大学校园,但上海师范大学“女儿节”所开创的将大学校园作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文化空间的道路还是值得继承发扬下去的。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大学校园有许多非常有利的资源。大学校里有良好的文化环境,有许多充满青春活力、赋有创造力、具有丰富的组织策划大型活动经验的大学生们,有对传统文化有深度研究的资深专家、教授,有众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还有许多可以利用的活动场地和设施。将大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场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现今的大学不仅要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有利资源承担起保护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而且培养高素质人才与保护传统文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大学作为非遗“博物馆”

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的创始人翁敏华教授曾指出,“保护和研究‘女儿节’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学应该义不容辞。大学应该把抢救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在培养一代英才的同时保护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大学就应当是一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③同时她又指出大学虽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但保护“女儿节”传统并不只是保护古董,而是为传统提供了在“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和平台”^④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人口日渐增多,传统乡村人口正日渐减少。传统文化得以生存的乡村空间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传统节日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限制。如此一来就更加需要城市在传承传统节日文化方面做好工作。那么,城市如何传承呢?有不少学者通过考察国外城市的民俗保护状况提出了建设城市博物馆的建议,如今,北京、洛阳等

^① 王少峰《公共政策与文化空间》选自《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② 李彩萍《文化空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域》,选自《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73页。

^③ 何连弟《上海师大重拾传统“女儿节”》,文汇报,2005年4月7日第6版。

^④ 何连弟《上海师大重拾传统“女儿节”》,文汇报,2005年4月7日第6版。

地都已经建立起了民俗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的确在城市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保护方面起到了作用。但民俗博物馆多以开设展厅、展览风俗、供民众参观为主要方式,民众无法亲身参与其中,很难真正体验节日的欢快热闹氛围,以及带个人内心的种种感受。因此,传统文化还城市的保护工作还有待完善,需能让民众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和感受。但是,如何能在大城市中保存动态的传统文化并使之得以在传承呢?

上海师范大学的“女儿节”就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将大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博物馆”。通过举办校园节庆活动的方式,传承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当然,这种传承有可能是经过移植和改造的。但较之于任其在都市中消亡,应该要好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大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地,未必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第三节 “女儿节”功能分析

节日的功能是节日价值的体现,是节日得以长期发展的根本之所在。那么,“三月三·女儿节”又具有哪些功能呢?“女儿节”作为一个现代节日,具有了调节现代生活的功能;“女儿节”作为以女性为主体的节日,具有对现代女性进行性别教育的功能;“女儿节”作为糅合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现代节日,具有增强现代人文化认同的功能。

一、调剂生活功能

节日调节功能主要表现在调节生存或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他人、个人与自我这四对对立关系上。^①前两组对立关系在传统生活中表现的较为突出,是传统节日主要调和的矛盾。后两组对立关系则在现代生活中表现的比较突出,是现代节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传统的“三月三”主要通过水滨祓禊、祭祀高禩祈等习俗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之情,以祈求神灵保佑人类生命健康、子嗣兴旺。而上师大创办的“三月三·女儿节”则用以调节现代生活中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自身之间的种种矛盾。

上师大“女儿节”创办于大学校园,因此它首先具有调节校园生活的功能。

^① 廖冬梅著《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55页。

传统的大学生活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较少,在大家心目中,教师是知识传播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似乎除了学习之外,两者之间再没有别的交集。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距离,产生了隔阂。上师大通过让教师和学生一起参与到“女儿节”的组织筹划活动中,不仅增进了学生之间、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甚至学院之间感情,同时也增强了整个学校的凝聚力。许多学生通过参与“演讲比赛”、“辩论赛”、做“女儿餐”、“布置闺房”等活动发现了自己在学习之外其它方面的潜在优势,获得了自信。

参加过首届女儿节活动的林嘉婷^①同学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道:“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以‘回归弄堂游戏’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游戏活动。我们一起跳房子、跳皮筋、放风筝,大家玩的不亦乐乎。”她还说道:“我们这一代由于居住环境的变化和繁重的功课压力,小时候很少有机会玩这么多集体游戏,每次看到电视上小朋友玩那些游戏都挺羡慕的,那次活动真是给我们恶补了一下,现在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我们的大学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2008年“女儿节”走出了校园,发展成为上海“东方女儿节”,吸引了上海数万在校女学生和在职女性白领的参与。与此同时,“女儿节”还具有了调节都市女性生活的功能。现代都市生活竞争激烈、压力重重。在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之后,都市女性需要一种彻底放松身心的方式。但是由于受现代生活方式的限制,都市女性只能通过购物、看电影、K歌、朋友聚会等方式来排解工作生活中积累的不满情绪,这些娱乐活动看似丰富多样,但却多是个人或很小群体内的活动并且多是室内活动,很难达到使女性彻底放松身心的效果。“女儿节”让女性从校园、职场中走入大自然,在长风生态园,她们投放祈福漂流瓶、学做女儿餐、参与旗袍秀。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现代女性的风采,还让她们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中、在愉快的节日活动中暂时的忘记了烦恼。“女儿节”活动可以帮助女性修整心情,以崭新的姿态重新迎接生活的挑战。

二、性别教育功能

“女儿节”作为以女性为主体的节日还具有对女性进行性别角色教育的功能。性别角色是特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和群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以及被

^① 林嘉婷:上海师范大学04级女子学院学生,曾参加过首届“女儿节”活动。现在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08级古代文学专业学生。2011年3月22日于上师大西六613宿舍对其进行了采访。

该社会和群体规定的行为模式。^①性别角色与人们的就业与生活密切相关,对于以女生为主的师范类院校,对女生进行性别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性别教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多是通过家庭教育来完成的。但由于现代生活方式转变,都市中的许多家庭对于孩子的性别教育还处于无意识状态。许多学者指出了现代生活中性别教育缺失以及大学生在性别教育方面存在问题。^②通过丰富的节日活动让女性明白其将来在家庭和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了解自身的优势所在,对于女性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师大“三月三·女儿节”通过古筝、茶道、刺绣、剪纸等传统活动让女生更具古典的阴柔之美,同时通过“女儿当自强”——女大学生人生规划专题研讨会、“女儿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以及“我是女生”演讲赛等活动使得女大学生更加自尊、自信、自强。通过准备女儿餐、布置“闺房”之类的活动让女大学生明白自身自未来家庭中将要扮演的角色,通过参与知名作家、著名主持人等成功女士论坛活动,使女大学生开始关注和探讨自身的职业发展、社会价值等。女生们通过“女儿节”活动重新了解自我、重新塑造自我。通过节日活动使她们在面对未来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时能够多几分从容自信。

参加过两届“女儿节”活动的陈茜苑^③同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道:“通过与各行各业知名女性面对面的交流,我发现原来女性除了担任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角色之外还可以扮演那么多的社会角色,女儿节活动让我们懂得女性除了照料家庭之外还可以对社会做出许多贡献,让我们开始思考自身的社会价值。”她还说道:“‘女儿节’不仅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还给我们女性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同学们有的负责策划、有的负责组织、有的负责具体执行,每个人的才能都在这次活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实,中国的传统节日也具有一定的性别教育色彩。民间有“男不祭月、女不祭祀灶”的俗语,中秋节祭祀月神的活动就只允许女性参与。七夕节的祈巧活动也具有浓重的女性色彩,这些传统的节俗活动在无形之中让传统女性明白那些素质是她们必须具备的。日本的节日中甚至有分别给女孩、男孩过的节日。日本

^① 刘卫华《性别角色对女大学生就业影响分析》,《理论月刊》,2006年09期。

^② 方 蓓《我国基础教育中性别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董晓璐《大学生性别教育的缺少及对策思考》,黑龙江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

^③ 陈茜苑:上海师范大学06级女子学院学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10级民俗学专业学生,参与并策划过2007、2009两届“女儿节”活动。2011年3月28日于上师大西部图书馆对其进行了采访。

把三月三称为“女儿节”，把五月五视作“男孩节”，女儿节要给家中女孩摆放偶人，男孩节要给家里的男孩子挂鲤鱼旗。女孩有女孩可以过的节日，男孩有男孩过的节日，男女不同的节日，不同的节俗活动。通过节日活动将性别概念潜移默化在孩子的思想中。由此看来，节日是性别教育的绝好时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代女性更需要“三月三·女儿节”这样的节日让她们领悟女性在现代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三、文化认同功能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①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②，是“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③文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等。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④在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认同危机。

“女儿节”作为一个现代节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有效利用，将茶道、旗袍、剪纸、女子成人礼、漂流祈福礼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以公共娱乐的方式让现代人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在调节现代都市生活的同时，增强了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参加过多届“女儿节”的毛文静^⑤同学指出她是通过“女儿节”了解到中国的“三月三”文化的。她说道：“在举办‘女儿节’之前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三月三’，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这样的节日。‘女儿节’使我们对包括‘三月三’在内的传统节日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传统节日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民众最容易接受的文化，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但是传统节日发展到现代其古老的节俗多已经与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了距离。古人由于面临着种种生存的考验，所以三月三要在水中沐浴驱邪，

^① 韩星、杨永亮《孔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年01期。

^② 郑晓云著《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③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④ 闫顺利、郭鹏《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哲学反思》，阴山学刊，2009年01期。

^⑤ 毛文静：上海师范大学04级女子学院学生，现为上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08级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参与了从05年至今的“女儿节”活动。2011年3月21日于上海师范大学西八817宿舍对其进行了采访。

九月九要登高避凶，而今这些节日要在现代社会传承就必须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比如，现代的重阳登高活动就增加了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增进交流等新的内涵。“女儿节”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改造利用，使得都市中的民众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增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结 语

中国人过节,多以亲人团圆为主题,无论是春节还是端午、中秋都有明显的家人团聚色彩,所以节日举办地多选择在家中或者市井街道。然而“三月三”却独树一帜,不仅主题超越了家人团聚的范畴,就连举办地也选择在了野外。在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呼吸新鲜空气,感受鸟语花香,在开阔的绿草地上尽情地放纵嬉闹,这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态度、两性狂欢的娱乐精神是“三月三”的主要文化内核,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当倍加珍惜。

纵观“三月三”从古至今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

宽松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传统节日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魏晋至唐是“三月三”的兴盛期,这一时期“三月三”的节俗不断丰富,由汉代单一的水滨被褻活动逐步丰富为魏晋时的“曲水流觞”、“曲水浮卵”、“曲水浮枣”等曲水系列活动,唐时又增添了踏青、泛舟、竞渡等活动,并衍生出了上巳宴赏制度。“三月三”所取得的这些发展成果与当时宽松开放的社会氛围是密不可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的频繁更迭以及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使得其在文化上也呈现融合的态势,为“三月三”发展提供了较为开发的社会文化氛围。唐朝“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也为“三月三”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

官方的提倡和重视是传统节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三月三”的历史演变中,官方的重视一直是“三月三”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早在汉代,“三月三”便是从帝王至百姓皆参与的全民性节日,到魏晋“三月三”又受到了仕族阶层的青睐,至唐宋“三月三”被作为国家法定节日,并且在此日对朝中官员赐宴赏钱。在“三月三”由汉至唐逐步走向兴盛的历史过程中,官方的重视是“三月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有意识地发挥创造力、对传统节日进行适度的现代化改造是传统节日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三月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是社会经济水平、思想文化发展状况、节日自身演变规律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创造力是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传统社会,魏晋人将汉代以水滨被褻为标志的上巳活动,丰富为曲水流觞、曲水宴、临水浮卵、水上浮枣等水上系列活动;唐人更是发挥其超强的创造力,开创“三月三”踏青、泛舟、竞渡、竞射等花样繁多热闹欢腾

的新节俗，将“三月三”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当今社会，我们的传统节日面临着如何衔接现代生活，如何满足现代人需求的现代化问题。传统节日要现代化就应当在继承传统节日精神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发挥创造力对传统节日进行现代化改造。上海师范大学开创的“三月三·女儿节”正是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与探索。传统节日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携手共进。

致 谢

又是一年春来到，柳树抽出了嫩芽，学思湖畔鸟语花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论文终于成稿了。转眼间已经在上师大度过了三个春秋，在这三年里有许多人曾给予我关心、鼓励和帮助，是他们温暖着我的心灵，给予我前行的信心与勇气。

首先感谢导师翁敏华教授三年里对我的培养。在论文写作上，导师对我们严格要求并悉心指导，不仅为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在生活上，导师给予了我许多鼓励与关怀，导师亲手织给我们的袜套、手套已经陪伴我渡过了三个上海的寒冬，每每想起，便有暖流流淌心间。导师还带领我们春赏龙华桃花、重阳佘山登高，体验民俗活动，同时培养生活情趣。导师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诗意洒脱的生活态度深深的影响着我，并成为我不断学习的榜样。

感谢三年里教育和帮助过我的王从仁教授、范荧教授、顾鸣堂教授，感谢同门兄弟姐妹的关心与帮助，感谢民俗学专业的同仁们的相互鼓励，感谢家人及亲朋好友三年里对我的支持与关心。特别感谢涉县热心的亲戚及乡亲们对我关于涉县娲皇宫庙会的田野调查所提供的帮助。特别感谢毛文静、林嘉婷、陈茜苑三位同学接受我的采访，为我的论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年时光匆匆而过。三年是人生中的一个段落，三年是个结束，三年也是个开始，我将带着对恩师、对母校、对家人及对亲朋好友的感激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一、学术著作（按出版时间排序）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宋]孟元老撰 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宋]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南朝]宗懔撰：《荆楚岁时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清]顾禄撰：《清嘉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日]吉野裕子：《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

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程蔷、董乃斌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再推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涉县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法]斯特劳斯，俞先孟等译：《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赵东玉：《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尹荣方：《神话求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

陶思炎：《中国都市民俗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廖冬梅:《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张勃、荣欣:《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 金宏图、李萍主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
-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刘婷:《民俗休闲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二、学术论文(按时间排序)

- 韦润物:《南方少数民族“三月三”与古代中原上巳节习俗关系探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 李桐:《广西壮侗民族“三月三”节日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03期。
- 成林:《“三月三”溯源》,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
- 陈兰、陈立浩:《“三月三”节日民俗试论》,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
- 覃桂清:《“三月三”源流考》,民族艺术,1994年01期。
- 吕静:《上巳节沐浴消灾习俗探研》,史林,1994年02期。
- 刘瑞明:《古代雩祭文化的内涵是生殖崇拜》,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01期。
- 赵维平:《古代的上巳节和修禊事考》,周口师专学报,1995年S4期。
- [日]李心纯:《从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到日本的雏祭》,日本学刊,1996年02期。
- 刘维治:《从唐诗看唐代三月三上巳节俗的流变》,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02期。
- 刘竹:《节日文化与精神补偿论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02期。
- 王秀文:《中日三月三节俗比较分析》,日本研究,1999年03期。
- 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节俗的嬗变》,史林,2002年04期。
- 彭维:《南朝——上巳侍宴诗文的全面繁荣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 翁敏华:《论三部元杂剧的上巳节意象》,中华戏曲,2005年02期。
- 翁敏华:《三月三上巳节失落之迷》,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 孙思旺:《上巳节渊源名实述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2期。

- 王之涵:《新叶村三月三的文化考察》,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 赵 喆:《上古诗文中的水滨女子》,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 张丑平:《上巳、寒食、清明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 张 勃:《唐代节日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 张丑平:《上巳节袷褙习俗与水的文化内涵》,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4期。
- 贝堤栗:《上巳节:盛唐狂欢在曲江》,中华遗产,2008年Z1期。
- 覃妩周:《汉族上巳节对南方少数民族“三月三”的影响研究》,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 崔微微:《唐代曲江诗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 蓝雪华:《浙江丽水老竹畲族镇畲族“三月三”变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 赵伟含:《中国传统女儿节探析》,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 邱雅芬:《日本的偶人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
- 程安霞:《“三月三接姑姑”走亲仪式活动田野考察报告》,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附录一：上海师范大学“三月三·女儿节”图片资料



05 年女儿节的创办



09 年 东方女儿节 传统女子成人礼

任珑 摄 2009 年 04 月 13 日
星期一 来源：深圳特区报
A13 版《东方女儿节演绎传统成人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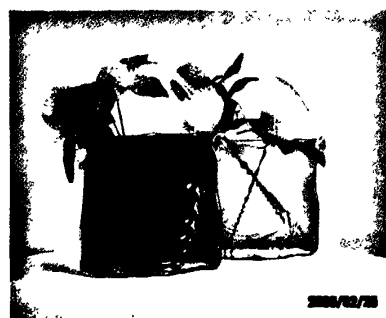
07 年女儿节才艺表演



08 年女儿节启动仪式



08 年女儿节学生作品展



08 年女儿节学生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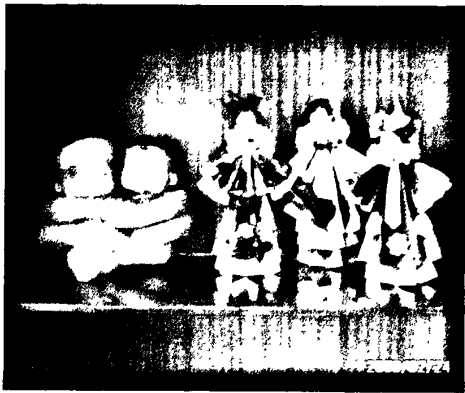
上师大女生利用生活中的废弃物制作的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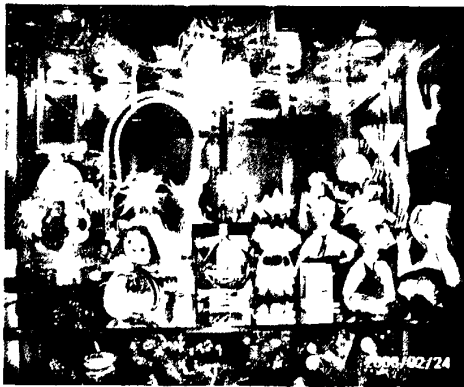
08 年女儿节学生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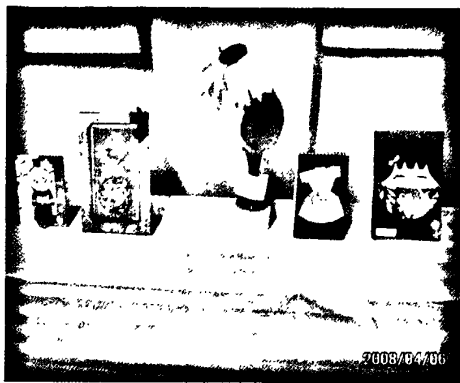
08 年女儿节学生作品展



08 年女儿节学生作品展



08 年女儿节学生作品展



08 年女儿节学生作品展



2010 年东方女儿节启动仪式



2010 年花样履痕旗袍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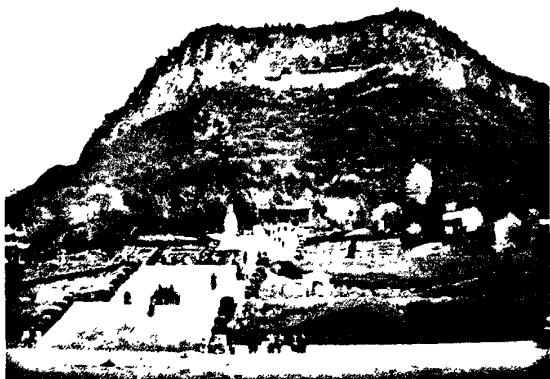


2010 年沪上知名女性参与女儿节



女儿节的的 Logo

附录二：涉县娲皇宫庙会图片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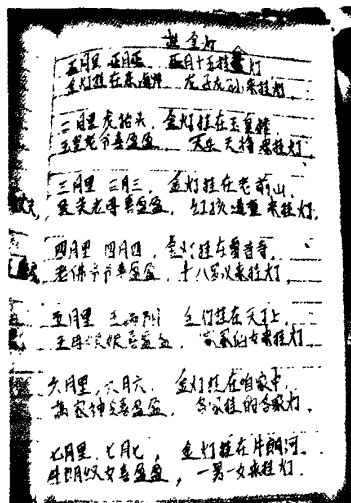
图一 涉县娲皇宫



图三 扇鼓



图二 庙会货摊上的香蜡与娃娃



图四 经歌《挂金灯》手稿



图五 唱大愿戏



图六 唱小愿戏

(附录二图片均为笔者 2010 年 4 月 26 日在涉县娲皇宫拍摄)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 《中原地区的“石不动”习俗及其成因》发表于《东京文学》2010 年第 10 期。
- [2] 《涉县娲皇宫庙会——古上巳之遗风》发表于《寻根》2011 年第 02 期。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刘君君 日期: 2011.6.1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刘君君 导师签名: 刘敏华 日期: 2011.6.1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师范大学硕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陈勤建

委员： 王从仁
顾鸣塘

导师： 郑敏华

